

Food Safety in China

舌尖上的威胁——中国食品安全分析报道

中外对话
chinadialogue

2012

近年来，中国食品安全问题正在引起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这一庞杂的系统性问题，涵盖了行政、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方面面。中外对话就这一问题与政府、学界、民间团体和食品行业展开广泛深度的对话，以系列文章形式呈现，层层揭示食品安全问题的根源，并希望以此带来更多人的关注与讨论。



前言

preface

为推动中欧环境健康与食品安全公共政策创新中的多元合作，中外对话推出《舌尖上的威胁——中国食品安全分析报道》，从国际视野分析评点，从多角度呈现中国食品安全的问题脉络、制度背景、焦点现象。本项目是“中欧公民社会对话项目”的一部分，由欧盟和英国大使馆资助，中山大学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和德国亚洲基金会支持。

我们以全面的方式多视角诠释食品安全这一复杂的问题。

第一部分食品安全现状与历史回顾重点回顾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发展历程与现状。我们以一篇综述性文章，来引领对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系统性回顾；一篇转载文章透过中国“化工”食品泛滥问题，展现经济、社会、政策等现实；并以添加剂和瘦肉精两个具体个案，管窥食品安全问题的内在机理；最后，我们以美国、日本、欧洲应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大致历程和监管体系，来提供对比和镜鉴。

第二部分奶业个案管窥揭示中国食品产业链中从原料生产、加工到检测的种种特有现实；并对此前曾引起广泛争论的生乳新国标中，各方利益诉求与标准的制定思考进行了分析；透过传统奶业和现代经营的对比，深入审视现代工业化食物生产中隐藏的安全问题；而作为食物工业化生产的反思者，美国奶业合作社的成长之路给予我们解决问题的另一种思考。

第三部分对中国食品安全问题进行了深度分析。《挑战常识的现代食品供应链》从食品供应链角度出发，分析了现代食品安全恶化的内在动因；《中国食品药品安全问题根源何在？》则从制度角度分析食品法律愈加完善、问题愈加严重的困局；《食品体系中的四方博弈与角色失衡》阐述了人类历史中食品体系的演变和发展，从经济结构角度分析了体系中的各方博弈与结构失衡的原因。《食品监管，等待第三方来拯救？》介绍了学术研究中有关监管制度和监管能力的讨论，“第三方监管”这种代表性的解决思路，是否能够应对中国技术监管的不足，成为解决问题的办法？

面对诸多复杂的食品安全问题，“出路在哪里”的发问，正在生气勃勃的公民行动探索中得到解答。第四部分公民参与的食品安全问题之下的个案分析，这一期重点探讨消费者与农户之间合作关系的“社区支持农业”，讨论重建人与土地联系过程中的尝试。

最后一部分以采访报道形式，从几个重要的视角再次讨论食品监管问题，第一篇对国务院食品安全办王国伟的采访，从政府部门战略角度，介绍中国食品安全的问题与前景；第二篇对国际有机运动联盟周泽江的采访，从有机认证行业的角度，讨论有机食品和食品安全问题的关系。《自己动手，创新食品供应链条》介绍了小型生产、销售企业在产业链中的探索。

责任编辑：周维

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十年春秋

文 / 徐楠

编者按：过去 10 年，中国食品安全问题集中暴露。徐楠回顾了过去几十年食品问题的发展历程，以及社会及政策在应对食品问题过程中的变革。

世界卫生组织对食品安全的定义是“食物中有毒、有害物质对人体健康影响的公共卫生问题”。

从 2009 年到 2010 年，以食品安全法、高层次议事协调机构——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食品安全标准评审委员会为标志，中国更新了应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法律机制、协调机制和科学评估机制。

此前 10 年，是食品安全问题浮出水面、集中爆发的历史阶段。

然而问题并未就此消失。围绕乳和乳制品，食品安全标准评审委员会完成了首批评审成果。据参与这一工作的食品安全专家委员会委员介绍，在一年多工作基础上形成的 60 余项标准，经过了长时间讨论，完成了艰难的部门协调。

然而，它们还是在社会上激起了一些负面反响，有媒体称其是“历史性的倒退”。

这从另一个侧面，折射了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深刻和艰巨性。

以 1949 年为时间起点，有研究者将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949 ~ 1984 年——粮食作为基本食品的数量短缺，是社会面临的最大不安全因素；

1979 ~ 1984 年——粮食安全基本解决，但提高产量的代价是农药化肥的普遍使用、直至过量使用，这是食品源头安全问题的萌芽；与此同时，食品供给链条从统购统销的高度计划模式，逐步转向市场，粗制滥造、检验简化或不检验的小作坊在食品加工企业中占比巨大；知名企业趋利忘义，在利益驱使下，食品生产的各

总 览

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十年春秋	1
中国食品行业的“化工”时代	5
从食品添加剂管窥食品安全问题	10
中国“瘦肉精”从科研到市场	13
食品安全问题的国际进程	15

管 窥

中国乳业个案剖析：抹不去的灰色地带	19
从生乳国标争议看食品安全标准清理的是与非	24
牛奶传统生产与现代经营的困局	28
美国“有机山谷”的奶业合作之路	32

纵 深

挑战常识的现代食品供应链	36
中国食品药品安全问题根源何在？	40
食品体系中的四方博弈和角色失衡	43
食品监管，等待第三方来拯救？	45

行 动

中国消费者与农民尝试建立健康关系	47
北京有机农夫的志愿市集	53
日本人怎样吃上安全蔬菜	55

见 解

舌尖上的中国，成长中的烦恼	58
有机认证拯救食品安全？	63
自己动手，创新食品供应链条	66



一家绵阳蛋品企业为应对食品安全问题，探索全产业链生产。图片：《绵阳晚报》

环节都开始出现问题。

1984 ~ 2000 年——食品安全问题起步期，《食品卫生法》颁布，国家制定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生产和监管标准。有学者认为：绿色食品作为优质食品这一理念的兴起，标志着中国食品安全问题成为食品体系的结构性问题。

2001 年至今——食品安全问题集中爆发，同时也是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发展期，中国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2009 年《食品安全法》发布，传承多年的“食品卫生”概念，被“食品安全”取代。

以一次次公共事件或食品信誉危机为标志，中国社会在短短十年内，步入了对食品安全的普遍警惕和不信任心理。

2003 ~ 2004 年，食品安全事件始呈频发之势，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显著的区域性、舆论焦点大多对准具体品牌、某一区域的具体食品类别，事件表现多为显性的食物中毒或病发入院。及至 2005 年，石腊火锅底料、石腊油大米、毒泡菜毒韭菜毒粉丝毒黄花菜……——违规化学添加、加工程序带来的潜在危害，开始成为食品安全关注的焦点，并且开始引发公众对某个食品类别的整体性担忧。

当时的舆论反思和监督矛头，经常被指向中国标准体系的粗陋。

很快，质疑的矛头不仅于此了。

苏丹红引发的“红色心理恐慌”是一个标志性事件——食品安全信任危机的区域性、局部性、食品门类的特定性，转向普遍性、广泛性、所涉食品门类的多样性。

2008 年的乳业三聚氰胺事件，是又一个节点事件——食品链条中的不安全因素，完全可能潜藏在全行业几乎所有大企业中。一个食品门类的整体信誉全军覆没。

当国人每年吃掉 300 万吨地沟油的数字披露出来，公众现出疲态。存在多年的地沟油产业，事实上早已广为人知，盘根错节、形成自己的现实利益链条。

十年来的历程，基本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沉疴新疾在食品领域的全面暴露，并成为全社会付出的巨大代价。食品供应体系因

为链条较长、从农田初级产品到终端制成品跨越了农业到工业的多种产业形态，显得尤为复杂艰巨。大量小作坊为广大数量的人口支撑着基础食品供应，行政监管在一些环节近乎为零，多头管理政令迭出，不同系统的标准相互打架造成执法窘境，鱼龙混杂的企业行为不断跌破自律底线，

行业没有约束机制却“心照不宣”，“科研”服务于产量和卖相，地下市场混乱，资源浪费严重，在降低成本的市场合理性之下，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广义的食品安全问题，作为食品工业现代化过程中的普遍问题，在西方国家的自由市场发展阶段，也都无一例外地出现，并非中国独有。根据 WHO/FAO 统计，近 10 年内，世界各大洲都有食源性疾病爆发。

利益驱动、生产者和消费者信息不对称，法规不全，监管不力，这些都是各国食品安全的共性。但各国在应对食品安全问题过程中的立法、司法实践，以及行政管理机制、社会响应机制，呈现出鲜明的差异（本专题将另外撰文介绍）。特别

十年来的历程，基本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沉疴新疾在食品领域的全面暴露，行业没有约束机制却“心照不宣”，“科研”服务于产量和卖相，在降低成本的市场合理性之下，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是中国缺乏典型的成熟的现代消费者运动，面对食品问题，消费者作为一个群体进行市场选择、表达呼声的主动意识较弱。吉林大学哲学研究院学

者吕方认为，这是我国食品继续安全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问题关乎制度、经济、社会、文化各个层面。

于是，过去数年中的中国社会，不断上演着“报料曝光——舆论哗然——市场缩水——公众谈虎色变——政府救市”

的程式。到 2008 年，每有一种农产品受到消费者质疑，链条另一端的现实便是农户经济利益的严重受损，源头生产的集中程度提高，大规模工业性生产逐渐驱逐分散的农业性生产。

随着食品安全问题在十年中的逐层深化，不断有专家指出：公众在食品问题上存在一些认识误区，比如对零风险的要求、对化学污染的过度重视、对假冒伪劣和食品安全的混同。背后的意思可以归结为一点——食品供应体系已经是一个工业门类，必须认识到其作为工业门类的特性，而不是以农业视角来考察了。

中国工程院院士、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首席专家陈君石一再提醒公众：“好的食品是生产出来的，不是监管出来的。中国有两亿多农户在用分散的方式生产所有的鸡鸭鱼肉。这个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源头污染的治理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另外，在当前近 50 万个食品生产企业中，大部分是中小型企业，要防止诸如产品的微生物指标超标、超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等问题，也必须先提高其从业人员的素质。”

此语背后，意在提示人们：只有进一步加强食品产业的工业化程度，让工业属性在整个供应链条中全面替代农业属性，才能解决目前的食品安全问题。

然而人们已经开始怀念传统农业中可持续的生产智慧，对传统饮食文化的回

归成为一股社会思潮，更有环保人士由肉类生产中的普遍健康隐患，开始反思食品工业中人与动物的伦理问题。

2009 年末，美国纪录片《食品公司》在网上流行。中国人在自身的食品安全挑战中，与一些西方人士共同开始了对市场逻辑主宰食品工业的根本性反思。

除了市场监管、行政体系、立法司法等等规范手段，也许食品生产被塑造为工业形态的路径和前景，才是食品安全问题带给人们的终极思考。陈君石院士曾表示：没有人不希望享用杜绝化学品的、清洁的、小规模就近生产的饮食，但在今天的人口基础上，这是否可能？

这才是沉重的发问。

在食品工业已经完成现代化的主要国家，几乎都有社区支持农业的实践——消费者直接联通生产者，在信任基础上共建食品供应链条。这是公民社会对创新食品供应渠道做出的尝试。当然，在庞大的食品工业体系面前，这些努力只能产生有限的局部效用。

集中爆发的食品安全问题，虽然让全体中国人付出巨大代价，却也激发了中国民众自主改变现状的空前热情。特别是 2008 年三聚氰胺事件之后，社区支持农业在中国各级城市蔚然成风，被中国媒体称为“餐桌保卫战”。🔗

徐楠 中外对话北京办公室副总编辑

中国食品行业的“化工”时代

文 / 宫靖 崔箐 王箐丰

编者按：近年来，中国食品行业造假问题日益广泛，从民间到大企业，其手段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科技难度越来越“高明”。是什么使化工物质、添加剂在食品中如此泛滥，又禁而不止？

最近十几年，正是中国食品工业化进程快速推进的时期，在为国人带来诸多福祉的同时，也衍生了通过化工方法进行食品造假的行当，引发诸多食品安全事件和事故。

让人忧虑的是，十几年来，民间用化工方法进行食品造假的手段，越来越“高明”，越来越精细化，变得更难于发现，甚至难于检测。

工业原料凶猛

国家药监局 5 月份的毒胶囊抽检，几乎覆盖全国所有胶囊企业。最终证实，占全国 12.7% 的 254 家药企在胶囊中使用了对人体有害的工业明胶。

这远不是问题的全部。中国农业大



图片：财新《新世纪》

学食品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认为，如果连监管严格的药品胶囊中都如此普遍地使用工业明胶，那么明胶使用大户——糖果，特别是销往农村的那些糖果，安全吗？还有美容用的胶原蛋白呢，安全吗？

早在 2011 年 4 月 19 日，卫生部即发布了一个特殊的名单，汇总了 47 种国人食品中可能被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

以及在 22 类食物中易被滥用的数十种食品添加剂。而在此之前，农业部也公布了一份“禁止在饲料、动物饮水和畜禽水产养殖过程中使用的药物和物质”名单，同样有数十种化学类物质在列。

食品安全专家指出，上述两份名单仍不全面，民间使用化工物质在食品方面造假，远走在主管部门的清单前面。

而工业原料进入食物的经济逻辑异常简单，工业用原料与食用原料，往往有成倍的价差。在低价为王、食品监管并不严厉的当下，低价的原料意味着更大的市场和更多的利润。

被“化学”的食品

卫生部名单显示，在工业用原料之外，还有多达 38 种非食用添加剂被用于食品，其绝大多数为化学合成物。

与工业用原料一样，使用此类非食品添加剂的动机是逐利。要么使食品的产量虚增；要么使差的食物有好的看相和卖相，卖得高价。更可怕的用途，在于改头换面，用低劣的食物，冒充更贵的食物，例如普通白酒加入毒性较强的农药敌敌畏，冒充茅台酒。

在非食用添加剂之外，卫生部“全

国打击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专项整治领导小组”还发现，各地市场上还存在合法食品添加剂滥用现象。上述名单指出的 22 个食品领域中，数十种合法添加剂被点名。

研究表明，人们长期过量食用合法食品添加剂，也存在致癌、致畸、致突变风险。

一位食品安全专家认为，滥用合法添加剂现象在食品领域已非常严重。多数的城市家庭主妇，在厨房里操劳时可以发现，被“化学”了的食品几乎出现在各个食品领域。

魔高一丈

多位受访的食品安全专家认为，随着食品化工学科在中国广泛开展，这门可以造福人类的科学，同时也被部分道德水平低下的食品从业者，甚至食品科技人员反向利用，用以作恶。

多种“化学食品”的制造过程超出专家想象。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博导王世平举例说，三聚氰胺掺入牛奶，不是农民能想出来的，普通科技人员也想不出来，这需要熟悉牛奶检测办法凯氏定氮法的缺陷，会计算各种添加物质的蛋白含量，还要熟悉添加物质的基本化学特性。

让专家们惊诧的，还有近年出现的发

制豆芽的无根剂。无根豆芽素是一种激素农药，能使豆芽细胞快速分裂。用无根剂刺激过的豆芽更长，而且不生根，白白胖胖，卖相很好。长期食用这样的豆芽，有致癌、致畸形的可能。问题是，谁把它们用于发制豆芽？类似的还有“化工猪蹄”、“化工腐竹”。

杜邦营养与健康大中国区总裁李永敬博士，是中国食品科技学会副理事长和（美国）食品工艺师协会（IFT）资深会员。他注意到，这些东西制作过程较为复杂，其化工品添加量、添加时间点多有讲究，非普通人能发明。

在现实中，朱毅、王世平感觉到，食品领域的造假手法确实发展较快，几乎每个造假领域都在完善造假手法，让执法者和消费者更难发现。

近期佛山发生的工业盐事件，由于其配比和手法较为讲究，以致当地质检部门两次化验都无法验出酱油中工业盐成分。同样可以佐证的是，在三鹿三聚氰胺事件事发前，包括三鹿、伊利、蒙牛在内的诸多乳企，均有使用含该物质奶源的历史，但长时间未被发现。

朱毅观察发现，民间的“化工食品专家”出于逐利需要，仍在不断进行着“发明创造”。如近年市场上出现的让饭菜更香的一滴香，让红烧肉加倍美味的肉宝，可将猪肉制作成“牛肉”而难被识破的牛肉膏等。经专业人士研究，上述“发明物”，



图片：光明网

均由民间食品人士把各种合法添加剂和部分未证明无害的添加剂，进行各种配比的搭配而成。

公众的胃，正成为这些化学食品的试验场所。

大企业来了

数十种非食用化学品，进入国人食品作恶的历史已有十几年。之所以最近数年才引起公众的普遍注意，是因为一个新动向：大企业加入到作恶队伍。

从2005年麦当劳、肯德基的苏丹红事件，到2008年三鹿三聚氰胺奶源事件，之后，国内大企业涉事被频频曝出。为什么拥有品牌美誉度和市场占有率的大企业，也不惜违法涉入不入流的食品、药品造假？

专家们认为，问题化工食品的产生有两个前提。第一，除少数类型外，此类作过手脚的食品对人体虽有害，但不会即时发病，均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显现出来，且有健康问题也无法追溯到具体的问题食品。第二，是拥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正处于城市化进程中，从贫穷逐步走向富裕的人口在此阶段识别力不高，偏好更偏宜的食品。

一个产业恶性循环已经形成。首先是一些个体户、黑作坊制作问题食品；其次卷入的是与这些个体户、黑作坊直接竞



图片：医药卫生网



添加苏丹红的鸭蛋

争面临巨大成本压力的部分小企业；最终，大中型企业也相继卷入。

在这个恶性循环充分展开的过程中，参与者所遭遇的惩罚，与其获利相比，都微乎其微。

朱毅认为，食品政策的制定者应注意这种逆淘汰现象，阻止这个恶性循环的继续发展。

中国式难题

食品专家指出，西方发达国家历史上也有过同类安全事件多发时期，但这类事件当前在中国多发到如此程度，确实让人惊诧。

建立清晰的食物追溯制度，是国际通行做法。李永敬举例，在美国的市场上买一个梨子，想知道它来自哪个农场，是件容易的事。想知道一瓶梨子罐头中各种添加剂的来源，也能够实现。但在中国，却是一个难以实现的难题。

美国每个食品环节，均由有品牌的大中企业完成，中国农产品和肉禽、奶源等，则来自数以亿计的农户、小规模养殖场、种植区；在流通环节，与西方稳定的企业供应关系不同，中国此环节由难以计数的个体户、二道贩子等完成；在食品生产制作环节，个体户、小作坊占了大多数，黑作坊也参与其中，处于丛林法则中数以万计的中小企业，也参与其中。

从农户到餐桌，在中国是一个太长的链条，从业人员太多，产品品种太多，销售网点太多，消费者太多。

这种食品生产现状，让中国农业、工商、质监、卫生等八九个食品质量管理部门，也难以真正进行全方位监控。食品专家普遍认为，要在中国的现状之下实现完全的食品追溯，其成本将高昂得让社会难以负担。但朱毅仍然认为，未来中国要

实现食品安全，出路还是食品追溯制度。

李永敬和朱毅共同提到，中国公众受到的食品安全教育普遍不足。一个现象是，西方偶尔也会有廉价问题食品出现，却很少被居民选择，此类事件也难于吸引公众的注意力，原因是他们有独立的判断，对明显低于成本的食品存有天然的怀疑。但中国的现实是，较贵的品牌食品虽经多年发展，仅是一个小众市场，更多的居民仍然以价格低廉，为购买的第一导向。

最根本的问题在于，中国针对问题食品的末端惩罚太轻。更多的现实是，作恶者很少受到惩罚。国际上的一个常识是，食品监管不能缺位，更不能抑制受害者寻求法律救济。否则，如朱毅所说，怎么能防止中国食品市场竞争变成“谁更无耻，谁道德更低劣”的较量？

原文刊于《新世纪》2012年第22期

从食品添加剂管窥食品安全问题

文 / 东仁 陈言 米艾尼 李静

1973年，毕业于日本山口大学化学系的安部司在食品添加剂公司做销售员。亚硝酸钠、山梨酸钾、甘油脂肪酸酯……这些“魔法粉末”让安部司尝到了越来越多的乐趣和成就感。10年间，安部司成了食品添加剂公司的首席推销员。他的绰号很响亮——“添加剂活辞典”、“食品添加剂之神”。他甚至渴望创立“全国第一的添加剂公司”。

他坚信，自己是在为食品加工厂排忧解难，帮他们用最低的成本做出好卖的产品。

一个相熟的饺子皮加工厂，为饺子皮总是粘到机器上发愁，剥饺子皮的时候必须停机。安部司建议他们加乳化剂和增稠多糖类，这个厂长买了四种添加剂。“加进那个之后，机器一次也没有停过。那种‘药’真厉害啊。”

一家以面条筋道、骨汤香鲜著称的面店，安部司建议老板使用乳化剂、磷酸盐，不用什么手艺，谁都能轻松做出筋道的面

条；再用具有增强鲜味的呈味剂、酸味剂调出桶装汤，兑水稀释十倍就可以用了。

鱼糕店老板手艺精湛，兢兢业业，但是超市嫌他们的鱼糕价格高，要求做些便宜的产品。安部司劝老板用进口的冷冻碎鱼肉，再加入化学调味料、蛋白水解物以及大豆蛋白，省时省力，还免去了采购鲜鱼并剔除骨头的辛苦。“使用冷冻碎鱼肉，是手艺人的耻辱。”老板起初不肯，后来还是舍弃了多年的手艺活，开始制作“添加剂鱼糕”。

安部司说，那时他做的工作就是添加剂的合理化，“添加剂不需要手艺人，没有技术也一样可以做出具有一定水平的东西。”可以用更便宜的原料，制作时间缩短，不需太多技术——安部司的“合理化”进展顺利，食品业者们很乐于接受。

直到1983年的那天，安部司女儿的三岁生日。回到家中的安部司突然发现，孩子们抢着吃的肉丸子，是自己帮助制造商开发的“得意之作”。“我才清楚地认

识到，我根本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吃这种肉丸。”他说，“原来我只认为自己是‘生产方’、‘销售方’，那一刻我才意识到自己也是‘买方’。”此时，许多以前熟稔的信息都变得别有意味。

某工厂的厂长总在私下里说：“我那里特价出售的火腿根本不能吃。”咸菜加工厂的厂长也经常说：“虽然价格超低，但还是不要买我们家咸菜的好。”因为那是把发黑的蔬菜漂白后，用合成着色剂上色而成的。

安部司并没有犯法，他一直严格遵守国家制定的添加剂使用方法、标准和用量，并且在产品标签上也做了明确标示。“但这样也抹不掉我的罪恶感。”

制造商降低了成本，超市以便宜的食品带动营业额高涨，消费者买到看上去干净又好吃的便宜东西，本来要花两个小时才能做好的饭菜，现在只要5分钟就能搞定——食品添加剂看起来对所有人都有好处。

但是，消费者完全不知道在什么样的食品里加入了多少添加剂，信息没有做到完全公开。产品配料表里一般都标注了

使用的添加剂。但是光读标签是读不懂的，安部司想要揭开其中不为人知的“黑幕”，他开始了对于添加剂的背叛。

“背叛者”安部司说，一味强调食品添加剂的危险毫无意义，它们带来了食品的便宜、快捷和方便，而且绝大多数都是遵照国家安全标准使用的。他主张的是添加剂信息公开——让消费者知道他们究竟吃了些什么，然后自己做出选择。

添加剂公司为了卖出更多的添加剂，将磷酸盐、亚硝酸盐和有机酸盐等数种添加剂混合在一起，按着色用、紧缩肉质用、改良品质用等

不同用途出售。制造商则被相关法律允许合并标示，即把若干种添加剂算作一种进行标示。

安部司知道，目前日本有1300多种添加剂，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有五六百种。他估算，一个人每天摄取的添加剂大约10克，一年约4000克，与人均每天食盐的摄入量大体相当。光吃一个三明治，就可能同时吃进去乳化剂、酵母粉、调味料、pH调整剂、磷酸盐、香料等20多种添加剂。每一种添加剂尽管都经过了国家质



检部门的检验，但复合摄取的结果究竟如何，却是未知和模糊的。

中国的食品添加剂有着相似的困惑和不同的经历。

北京北方霞光食品添加剂有限公司研发部经理张利胜回忆，1992年他刚毕业的时候，中国还没有专门的食品添加剂工厂，那时很少用食品添加剂，大家都不会用。直到1996年国家出台了GB2760《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才开始大量使用。

“那是90年代末，当时我们向国外大量出口肉制品，添加剂已经开始大量应用于食品加工了。”

张利胜说，当年刚接触食品添加剂，“觉得添加剂有点像毒药”。而现在，他相信食品添加剂是食品工业的灵魂。“添加剂为人类创造了很多新的食品和新的食品制作工艺。”

正因为人们对食物的外观品质、口感品质、方便性、保存时间等方面提出了严苛的要求。各个厂家拼命地改进食品，“提高技术含量”，想方设法地取悦人们的眼睛和舌头。结果食物越来越好看、越来越好吃。

不过，中国食品添加剂和配料协会的人士告诉记者，食品添加剂的问题，是出在“人工合成的化学品”，比如着色剂、防腐剂等上。“正是由于人工化学合成食品添加剂在食品中的大量应用，甚至是滥用，到了上世纪初，人们发现不少食品添

加剂对人体有害，还发现有的甚至可以使动物致畸、致癌。”因此，标准和规范异常重要。

与日本安部司的想法一样，张利胜认为，还是要让老百姓知道，吃的到底是什么。“你可以只在火腿里放30%的肉，甚至可以一点儿肉都不放，但是你得让消费者知道，这里面到底是什么内容。至于买不买，那是消费者的选择了。”

中国食品添加剂和配料协会的人士说，中国食品添加剂的一大问题是标准模糊。“目前批准使用的品种已达2300多种，但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品种不到300种。此外，近年来发展较快的复合食品添加剂也没有产品质量标准。”

超越“安全”和“标准”的问题之外，也有人在思考添加剂带来的更深层的问题。安部司甚至从社会伦理上反思添加剂的影响：需要花费时间、积累技巧的传统工艺被抛弃，膾炙人口的味道被认为是真品，人们，特别是儿童，会认为食物得来轻易，而不知对自然万物和他人劳动心存感恩与珍惜。

“日常生活变得方便、舒适、富裕，我们得到的东西很多，这是事实。但在其背后，我们是否失去了什么珍贵的东西呢？”他在他的书中这样写道。

原文刊于《瞭望东方周刊》

中国“瘦肉精”从科研到市场

文 / 苏岭

编者按：2009年2月，“瘦肉精”引致广州70人中毒，成为当时最受关注的食品安全事故。时至今日，经过多年的一再禁止，“瘦肉精”仍然未从中国市场彻底消失，新闻报道中常见其关于禁止和违法使用的消息。

据南方周末报道，养猪业内多位专家和从业人员曾透露，“瘦肉精”为行业潜规则，情形堪比三聚氰胺奶粉事件。

那么，是什么使这种被其他国家禁止已久的饲料添加剂突破科研，走进中国市场，并在中国各地落地生根，禁而不止呢？《南方周末》的这篇文章，是中国食品违法添加剂从科学研究到市场推广的典型案例。这篇在当时掀起社会波澜的报道，在今天读来，仍然值得回味。

上世纪80年代初，美国Cyanamid公司意外发现盐酸克伦特罗具有明显的促进生长、提高瘦肉率及减少脂肪的效果。此后，在1989年到1992年期间，欧洲地区连续出现因食用盐酸克伦特罗肉类引发的中毒事件。1988年1月1日欧共体禁止了盐酸克伦特罗物质当饲料添加剂的使用。1991年，盐酸克伦特罗被FDA禁止。

1987、1988年，国内学者开始翻译国外盐酸克伦特罗的论文。1989年内蒙

古农牧学院有师生开始研究盐酸克伦特罗。此后，东北农大、南京农大、浙江大学也开始了跟进研究，盐酸克伦特罗在中国成为兽药热门研究。这一时期中国发表的论文有四五十篇之多。

这一时期恰逢中国国内生活水平上升，消费者开始偏好瘦肉。媒体也公开倡导进行提高瘦肉率的研究。据前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许梓荣介绍，瘦肉型猪从国外引进，耗资甚巨，自行培育则要几代人的投入。如能直接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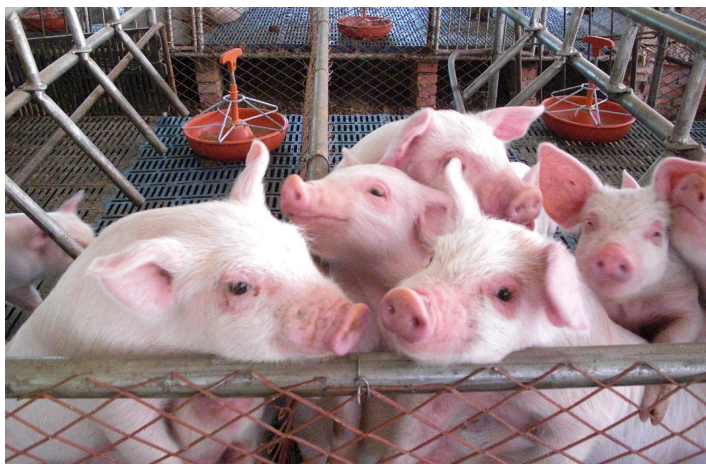
过饲料转化，提高瘦肉率无疑最便捷。

“当时以为是个很好的进步，猪用三个星期到四个星期可以增加至少 10% 的蛋白质。这 10% 的蛋白质，是一个搞畜牧的育种专家一辈子都无法培育出来的。”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兽医学院教授陈杖榴说。他当时身兼农业部兽药残留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兽药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但是，在全国各地的研究中，却没有一篇论文详细提及该兽药的副作用。许梓荣解释，那时国家正力倡培育瘦肉型猪，“我们也不宜和政府唱反调。如果在论文中介绍了副作用，我们（的论文）也发不了，所以我们有一些顾忌”。

此后，“瘦肉精”开始逐渐流行。挂靠于浙江大学的浙大阳光营养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大阳光）将盐酸克伦特罗推向养殖端。因为显著提高瘦肉的效果，被称为“瘦肉精”或“瘦肉多”，主要集中向规模化养殖场较多的湖南、湖北推广，“相当赚钱”。按照浙大阳光创立者陈剑慧的描述，他们几乎是有功于国家：“当时是属于很光荣的一件事情，每个省管农业的副省长都来推广，一定要用这个东西。”于是，生产、经营“瘦肉精”的企业越来越多。

1997 年 3 月，鉴于盐酸克伦特罗在



图片：lxkj.gov.cn

国际上引致的安全性问题，中国农业部下文严禁 β - 肾上腺素类激素在饲料和畜牧生产中使用，盐酸克伦特罗名列禁单第一位。

然而，甚至在今天部分专家还仍坚持认为“有毒的不是药本身，而是使用的剂量”，是“散养户不严格按科学办事，超剂量使用了”。

原文刊于《南方周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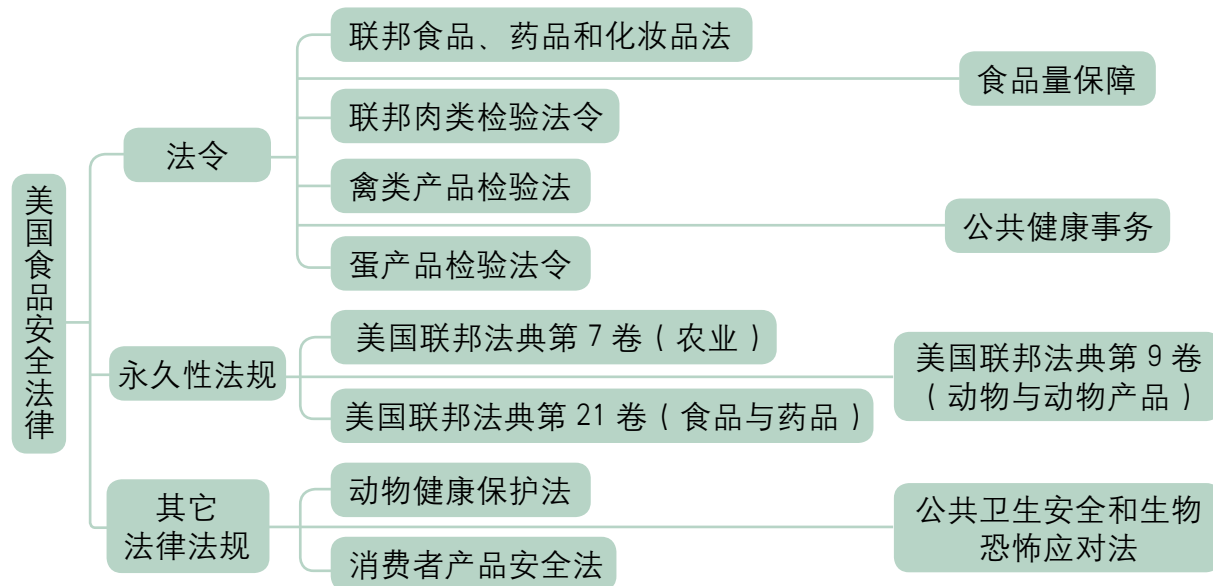
食品安全问题的国际进程

收集整理 / 张春

据 WHO（世界卫生组织）/FAO（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近 10 年来，世界各大洲都有食源性疾病的爆发；全球有 1/3 的人有过患食源性疾病的经历。食品安全问题是社会发展阶段的产物，各国出现时间不一，应对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发展历程亦有所差别。

美国

1850 年到 1900 年代初期，由于资本主义大工业的迅猛发展，食品贸易由各州扩展至全国。在巨额利润的驱使下，食品市场出现了制伪、掺假、掺毒、欺诈现象，生产商在食品中添加大量有毒的防腐剂和



美国食品安全法律框架图

色素。牛奶掺水、咖啡掺炭在当时成为司空见惯的事。直到 1906 年《纯净食品与药品法》颁布，这些问题才得到遏制。

进入工业化大生产后，美国食品生产又面临有毒有害原料和添加剂等问题。因此，1933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

2008 年凯文法案揭露了大型垄断企业流水化生产、快餐式经营产生的巨大问题。面对公众的巨大压力，美国众议院通过了《2009 年食品安全加强法案》，对现行的《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进行了 70 年来最严格最大规模的修改。

2011 年，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FDA·食品安全现代化法》（FDA Food Safety Modernization Act, FSMA）。这一次对原有法律的大规模修订，标志着美国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从过去单纯依靠检验为主过渡到以预防为主。法案的实施扩大了 FDA 的权力和职责，也势必增加食品生产企业的成本和承担的责任，加大了输美食品阻力。在这一法案中，FDA 首次获得授权，可以对所有食品实施强制召回，有权禁止拒绝接受其检测的食品入境。

纵观美国食品安全问题的凸显及应对历程，FDA 的不断强化是其明显特征。

日本

日本于 1947 年颁布《食品卫生法》。

2000 年，雪印乳品发生食物中毒，一系列类似的食物消费欺诈事件频发。

2001 年，日本开始实行食品追溯制度，是亚洲最早实行追溯制度的国家。农林水产省 2003 年发布《食品可追溯制度指南》之后，可追溯制度在日本全面实施。它可保证食品在生产、处理、加工、流通和销售的供应链各阶段，都能够得到跟踪和追溯。

在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的背景下，加之构筑绿色贸易壁垒的意图，日本国会于 2003 年通过了《食品安全基本法》，同年施行，并在 2003 年、2006 年、2007 年多次修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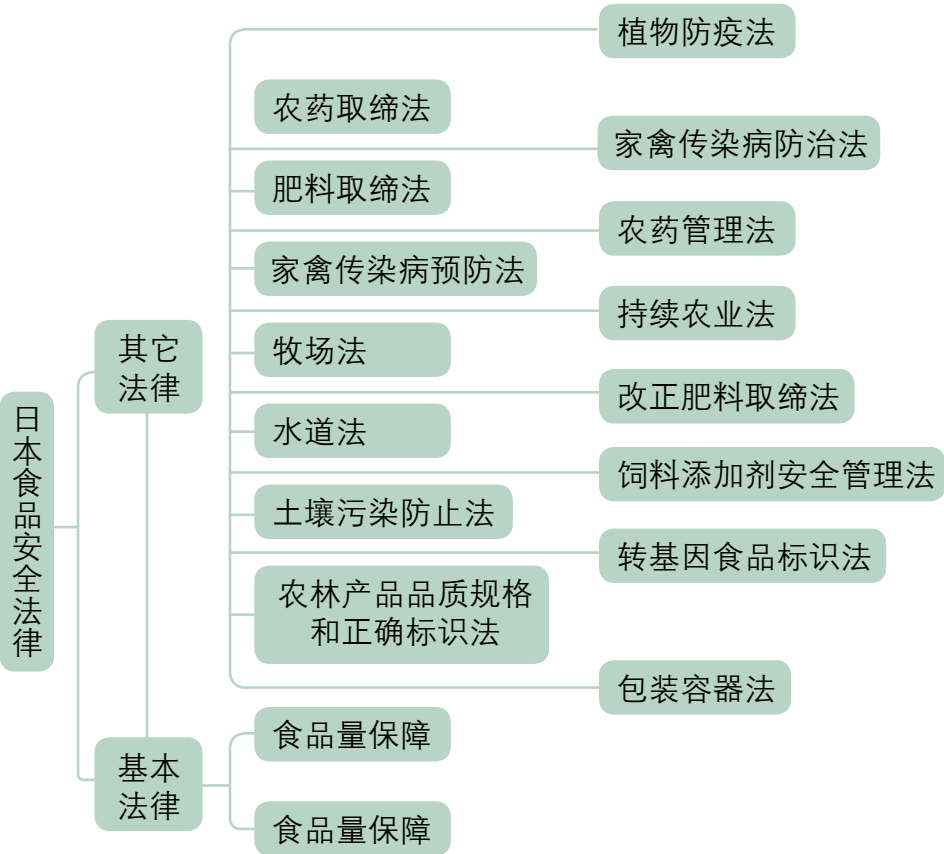
新法建立了食品影响人体健康的评价制度，设立了下辖于内阁的食品安全委员会专门组织。

2006 年，为了进一步控制食品安全，日本开始实施食品中农业化学品“肯定列表制度”，对所有农业化学品在食品中的残留都做出了规定，标准比美国、欧盟等更加严格。

欧盟

欧共体于 20 世纪 60 年代成立之初，就制定了食品政策。这是为确保食品在各成员国之间自由流通而确立的。欧洲食品安全问题和立法体系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形成阶段（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



日本食品安全法律框架图

1996 年疯牛病爆发）：

这一阶段，以补贴促进农业发展的共同农业政策，主要解决了食品的供应安全问题。

但是，为了生产更多的粮食，得到更多的补贴，欧共体农业普遍采取的集约化生产方式，造成化肥、杀虫剂的广泛使用。农民为了增加产量，拼命降低成本，

使用有病动物的下水、骨粉等作饲料，导致疯牛病、口蹄疫等动物性疾病频繁发生。

1985 年，欧洲委员会发表了“食物通讯”（又称“微型白皮书”），第一次将保护公众健康列入欧共体立法的重要议事日程。1987 年《单一欧洲法令》颁布，改变了以往片面强调农业产量的做法，将“环境保护必须成为欧共体其他政策的一

个组成部分”写入《罗马条约》。

立法改革、快速发展阶段（1996年—2002年）：

1997年4月，欧盟委员会发表了关于欧盟食品法规一般原则的“绿皮书”，为欧盟食品安全法规体系确立了基本框架。后来为各国食品加工业所采用的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Hazard Analysis and Critical Control Point，简称 HACCP）管理体系，也在此时诞生。

2000年1月12日，欧盟正式发表“食品安全白皮书”。它确立了欧盟食品安全法规体系的基本原则，并首次整合了整个食物链中有关食物安全的所有方面。在此框架下，欧盟于2002年1月制定了著名的《通用食品法》，同时成立欧洲食品安全局（European Food Safety Authority，简称 EFSA）。

完善阶段（2000年至今）：

自2000年以来，欧盟对食品安全法规和条例进行了大量修订和更新，建立了一个较为完善的食品安全法规体系，涵盖了“从农场到餐桌”整个食物链，形成了以“食品安全白皮书”为核心，各种法律、法令和指令等并存食品安全法规体系新框架。这是欧盟食品安全的完善阶段。

已经构建完善的欧盟食品安全法规体系具有以下特征：利益主体责任明确，食物安全可溯性，重视风险评估，食品

安全防御性原则，食品风险预警系统，及以保护消费者安全的出发点。

张春 中外对话北京办公室助理编辑
（图片内容：中国人民大学宋大维
硕士论文）

中国乳业个案剖析：抹不去的灰色地带

文 / 徐楠

编者按：中国乳业从“本地生产、本地消费”的传统模式向现代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奶源争夺战、品牌竞争、牛奶价格波动与打压、奶站关系网等一幕幕在奶品产业链的灰色地带上演。徐楠讲述了奶品行业的中国现实。

2008年三鹿奶粉东窗事发以来，中国乳业几乎一直不曾平静。

它将全行业的疮疤暴露在世人面前，其中蕴含的深层结构问题，远非一个品牌的质量监控所能涵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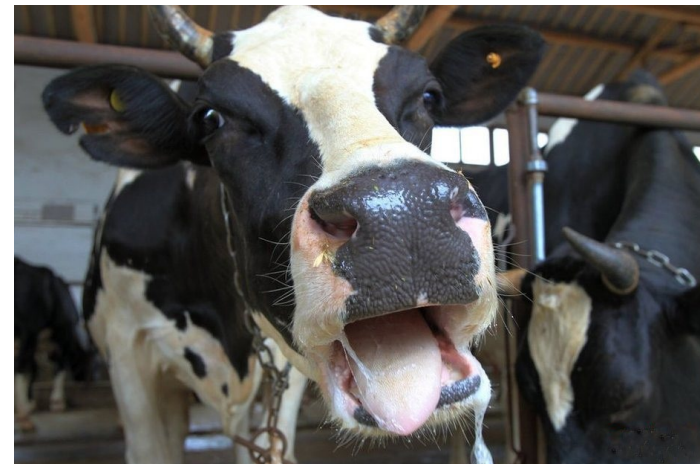
中国乳品加工行业及其产业链，几乎集中了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各个侧面。在食品工业与农业原产地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成为一个值得剖析的典型个案。

牛奶在中国的前生今世

与很多食品门类一样，中国乳品行业同样经历了一个由小农

供应特征转型为现代食品工业的过程。

牛奶进入中国人的饮食习惯，时间并不长。初期模式，几乎无一例外是分散养殖、本地养殖，以及牛奶在新鲜状态下的直接供应。



图片：《天天营养》

今天中国城市里的中年人，很多都还留存着童年时打牛奶的记忆：养殖场的车子一大清早把奶送出来，各家各户自备两个玻璃瓶，每天轮换；当天拿回来的牛奶需要在短时间内喝完。在天然牛奶保鲜时间限度内的储运链条，类似会员制的定点局部供应方式，都符合典型的“本地生产、本地消费”模式。

这是当时的储运条件所决定的，并且获得计划经济条件下普遍存在的国营农场的支撑。

随着“巴士杀菌”等牛奶加工技术的出现和普及，奶制品的储运链条被加长了，一些区域性的乳业品牌开始加速走向更加典型的现代食品企业，几乎每个省都基于原有的养殖场，形成了立足本省的乳业品牌，开始简单的加工生产、以及相对的远距离销售。

北京的“三元”、上海的“光明”、东北的“完达山”、以及华北市场的“三鹿”，都是典型的区域品牌。

中国乳业在此过程中获得了长足发展。2004年，中国人均奶类占有量18.4kg，1998年以来年均增长20.64%。

这样的局面，在2002—2005年间，随着以蒙牛、伊利等品牌为代表的全国性市场破袭战，而告结束。他们背靠大资本的支持，在各省抢占奶源，在利乐枕的技术支撑下，液态奶产品攻势迅猛。

很多区域品牌被打懵了。相对稳固

的供货关系和议定价格，受到空前挑战。伊利、蒙牛横空出世，分割了部分奶源，并很快建立了覆盖全国的品牌体系。

由此，牛奶从一种在家门口生产的食品，成为常温保存30天、易储易运的现代商品。到2008年，中国奶类总产量3781.5万吨，比1998年增长了446%之多。

人们更加接受了引用液态奶的习惯。蒙牛、伊利成为全国性品牌的最典型代表，光明、三鹿、完达山等，以一个区域为重点，同时对其他区域有部分覆盖；更多地方乳业品牌，在本省范围内生产销售。还有一些收缩到农村或乡镇市场。

而地方品牌与全国性品牌抗衡的，也早已不是其距离和储运优势，而是价格优势——二者背后的奶源生产和储运链条，已经几无区分。

与此同时，中国迅速崛起为全球乳业大国。1949年，中国只有12万头奶牛，到2004年，全国奶牛存栏1063万头，比1998年增长了149%，年均增长16.4%，到2011年，中国奶牛存栏数量已达1440万头。

从“中国土壤”里长出来的奶源供应

在中国奶牛行业发展之初，奶牛都养在国营奶牛场里，奶牛场同时承担牛奶的配送。10年前，随着“奶牛下乡，牛奶进城”，分散养殖的奶农开始为集中生

产的企业提供奶源，接着奶站应运而生，奶源经营模式变成“分散养殖，集中挤奶”。

依常识来推断，这绝对是一个更为合理的模式——集中的设备和管道既实现了批量的集中，也确保初级链条中奶源的质量控制。用奶农的话来说，“挤出来的奶，不接触我们的手，甚至连空气都不接触。”同时，企业和数量众多的分散奶农之间，无论谈判还是交易成本都非常高，奶站的存在，从运营模式上充当了中间渠道，应能解决这一问题。

实际上呢？

许多奶农当初开始养牛，是在政府的大力提倡和推动下，有的地方给予了贷款的优惠，有的地方给养牛户予以土地的政策倾斜，一头奶牛，在市场好时售价一万

多元，那是普通农户砸锅卖铁的价格，是绝对的大宗投资。一旦被套，其自我解套的空间很小。

在中国奶业疯狂增长的近十年间，价格、质量都成了企业激烈拼抢的筹码。面对这一切，分散的奶农完全没有谈判的余地。奶站就是他们的衣食父母。

1998年，伊利公司开始投入资金自行建立奶站，引入机械化的挤奶设备。每个奶站的建设成本在50万元左右。第二年开始，蒙牛主导的另一种模式横空而出——社会合作建奶站。牛根生曾自述：

“同行建一个奶站需要40万块钱，我4万块钱都没花。”蒙牛获得奶源，奶站从中收取管理费，这样的模式很快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各种各样私人个体奶站涌现



出来，还有打着各种机构名目的奶站，在各地“为奶农开辟致富渠道”。有些奶站上下游的价格差达到了每公斤5角钱。

牛根生是深谙基层社会运行逻辑的：“每一个自然村庄里，每一个养牛的区域里总有有钱的，也总有有权的，有钱的和有权的加起来以后，完全可以做这个奶站。”“有钱有势”的人，这样一个准确而微妙的指称，变成了奶源食物链运转的关键。

无论多大的企业，只要依托奶站来获取奶源，便万难回避末梢管理的问题。

明明是质量有问题的奶，只要“关系”过硬，给检验员打个电话进去，报上批号，便能顺利过关。

为了防范强大的“关系”搅乱奶源质量，一些企业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有的专门派驻人员常驻奶站，有的严格规定：运奶司机的线路每月轮换一次、各奶站的检验员每两周轮换一次……

惨烈的奶源争夺战

分析了历史和现实土壤，就不难想见：中国乳业，尽管在加入WTO之后获得迅速发展，但它很难是一个简单意义上的质量和服务竞争体系，而是从来都生长于鲜明的“中国水土”。

几乎与中国乳业市场加速发展同步，在20世纪90年代，大量国际乳业品牌看

好中国市场，纷纷涌入，却绝大多数折戟而归，包括法国达能，瑞士雀巢，美国卡夫、多美兹，英国与荷兰联合利华等等十多家。无论是找中国当地企业搞合作投资，或是独立投资运作，亦或只在中国销售自己的产品，除了因“大头婴儿奶粉”事件得到强化的高档奶粉市场，其他的胜者寥寥。

在2005年的中国乳业报告中，行业协会就已经提出了市场消费增长趋缓、“乳品加工企业利润下滑”的问题。规模以上乳品加工企业的亏损面，2002年占24.2%，2003年占27.5%，2004年占30.8%。乳品企业利税总额增幅下降，2004年比2003年下降18个百分点。

在这样的背景下，除了低估中国人饮奶习惯的发展速度，高价路线不适合中国市场等常态因素之外，外资乳业品牌缺失奶源控制权是重要原因。如广东省奶业协会会长王丁棉所分析的，大部分的国际乳业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后，多把精力和资本投放在奶品加工、奶品市场销售这两个环节上，对奶源往往掌握不了主动权，其直接结果就是产品终端成本过重，并最终丧失市场的主动权。

中国乳业，必然是一个产业链为王的行业、一个植根于奶源地的本土行业。

如上文所述，全国性品牌在2005年前后完成了市场“横扫”，形成了自此以来的奶源分配及其质量控制格局。奶源争夺战堪称惨烈。

而企业的价格战，还在年复一年地打响。每年夏季，是奶牛产奶的旺季、消费者喝奶的淡季；而冬季正相反，是饮奶的旺季、产奶的淡季。于是，夏季打压价格，冬季拉升价格，成为再自然不过的市场行为。去年，季节之间的价格差达到0.5元。

这也直接决定了奶农的悲喜周期：“一到开学、过节的时候，什么奶都收，各个厂子奶源部的人都下来，抢奶；他们不要的时候，你人还没到厂里呢，拒收单都开好了。一年里总要这么上上下下三、四回。”奶农们说：“一头牛挤出来的奶，不同时候的指标能差好几个点。反正检测标准是厂里说了算，他要你高就高，要你低就低。”

当质量控制可以轻易地成为奶源争夺战的筹码，一切就可想而知了。正如王丁棉所说：“牛奶本身含280—300种营养物质，不可能靠检测手段来控制奶质，必须是靠原奶的整个生产过程环节（环境、卫生、疾病）来保障。检测出一批不合格，只能把这一批废掉。指导思想应该是重在控制。”

每一次价格波动，最直接的后果都是抗御风险能力最低的散养小农出局。2007—2008年的市场波动中，根据陕西省有关人士的估算，原本占总量60%以上的养殖散户，减至30—40%左右。而这一次震荡，有可能将这个数字，减至15—20%。

奶业的利益布局，是典型的金三角结构——农民占3%—5%，乳品加工企业占20%—30%，销售商、包装材料、设备商等占去60%—70%。农民的利润太低，受挤压的余地很小，于是奶源质量成为被透支的代价。

这一个案，活脱脱地演绎了中国食品行业的典型现实：农业原产地几无利润，品牌之争冲击底线裹挟一切。“小、散、乱”的前端链条，和日渐工业化、资本化的前端企业之间，存在着监管难以保证的灰色地带，充分现代化的市场制度形态，和依然处于前现代的中国乡土逻辑并行其中。而行业平均利润又决定了：这一灰色地带是企业必争之地。☞

徐楠 中外对话北京办公室副总编辑

从生乳国标争议看食品安全标准清理的是与非

文 / 朱红军

编者按：2010年，中国生乳食品安全标准的修订曾经成为公众质疑与争论的焦点。朱红军回顾并分析了这场争论中，各方观点背后的思考与诉求。

2008年的三聚氰胺事件后，中国的食品安全管理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最显著的当然是成立了国字号的食品安全委员会，由副总理挂帅，15个部委机构参加。中国首次以如此高层次的议事协调机构来应对食品安全问题。

而相对不为外界关注的变化则是2009年下半年，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和食品安全标准评审委员会分别宣告成立。尤其后者，志在启动中国食品安全标准的清理和重塑工作，这被认为是开启中国食品安全工作新纪元的基础性保障。

生乳新国标是第一批食品安全标准清理重塑工作的成果，其释放的拨乱反正的信号却多少被忽视了。

在《食品安全法》颁布之前，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有多套国家级食品标准的国家。根据食品卫生法，有食品卫生标准，主管部门是卫生部；根据产品质量法，有产品质量标准，主管部门是国家质检总局；根据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有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主管部门是农业部。这三套标准都具有国家强制性，其间矛盾显而易见，同一指标往往规定不一，企业自是苦不堪言。

而30年间，中国的食品标准老了，旧了，更新慢了，仅有过三次大范围的颁布和修订。重启清理前，现行标准的标龄在10年以上的占了1/4，个别的标准甚至已超过20年未修订。而根据《标准化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规定，标准复审周

期一般不超过5年。

2010年初发酵的这场关于生乳新国标倒退的争议，几乎完全遮蔽了上述向上的积极意义，尤其标准清理工作，刚开始就被拖进了舆论的漩涡，显得举步维艰。

事情肇始于生乳新国标中关于蛋白质含量和菌落总数的两个量化指标，较旧标准有了大幅度的倒退，乳蛋白含量从1986年的2.95%，降到了2.8%，菌落总数则从2003年的每毫升50万的标准下调至200万，均为历史新低。而在丹麦、新西兰，及几乎所有的乳业大国，生乳蛋白质含量标准都至少在3.0以上，而菌落总数，美国、欧盟是10万，丹麦是3万，更是严至中国的数十倍，由是新国标被媒体定性为“一夜退回25年前”。

2010年6月，《南方周末》和《财经》杂志首先将此争议推向公共视野，此后一直延宕到2011年年底，这场争议始终未绝，即便主管部门的相关解释也未能平息公众的忧虑。

综观这场生乳标准的争议始末，自始至终引爆公众情绪的焦点问题主要是以下两处：

一是蛋白质和菌落总数这两个具体

指标的倒退，与国外差距明显，被认为是照顾中国落后的散户奶源的产业现实。安全问题岂能被落后的产业绑架？

二是生乳国标的制定中，吸纳了大企业参与，而这些大企业几乎都在三聚氰胺事件中有着不良案底。公众认为，标准极可能被利益企业支配。

这两处争议的实质，实际上也是所有食品安全标准清理工作中的共同矛盾，即中国的标准究竟要向国际看齐，还是要



乳品加工企业的套管式杀菌机 图片：czagri.gov.cn

兼顾中国的国情，妥协是不是不可接受？其次，标准的制定事关行业 and 产业发展，利益博弈在所难免，如何达成公共利益和行业利益的平衡？

这场争论因为缺乏相对公信的平台以及信息的透明度，最终的局面是，支持

者和反对者，各取极端，互相攻讦，加之乳业既有的利益纠纷从中搅和，致使科学客观的声音始终阙如，真相从未越辩越明。

笔者参与了相关报道，得以多渠道的倾听声音，客观而言，正如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君石所言，任何标准的制定都是妥协的产物，生乳新国

标的制定过程中，各种研讨会议不下五十次，行业内的征集意见也例行开展。笔者曾获得过一份业内的意见汇总表，听取范围包括行业协会，管理部门、企业等，相

关意见也纷呈不一，体现了不同的利益诉求。

这种博弈还不仅仅是所谓赤裸裸的大企业小企业的利益冲突，也不仅仅是巴氏奶和常温奶阵营的对立，如果说这些利益是公共阳光下可以忽视的细节的话，中国落后的奶源产业现实，各地参差不齐的养殖水平以及衍生的奶源质量水平，却是主政者绕不过的门槛。安全标准维系的是消费者的利益，而标准可能引发的利益波动，则涉及了中国大量养殖散户的切身利益，这又事关民生稳定。

制定过程中，主张调低标准的一种声音，认为三聚氰胺事件的根源，“正是既

有标准对奶源质量要求过高，普通散户的养殖水平达不到，才铤而走险纷纷对奶源做手脚”。农业部门的人指出，在内蒙古、黑龙江等北方地区，许多散户奶源蛋白含量连 2.8% 尚难达到，何谈 2.95%？

以黑龙江、辽宁、内蒙古为代表的北方奶源大省的奶协，更是立场坚决，甚至私下联合纵横，辽宁奶协秘书长卢戈川说，他们调研发现超过 40% 的奶户原奶质量不能稳定在 2.95% 之上。

反对者的理由有二，一则认为，造成养殖散户在产业链上的被动地位，并不是由标准高导致，而是由于大企业在其间的垄断和强势地位使然，即便标准降低，只要大企业行为依旧，散户的处境依旧得不到。二则认为，正常的科学规模养殖下，奶源蛋白质和菌落数都该轻易达标，中国的标准低，是因为养殖水平低下导致，所以才需要用高指标来倒逼产业完善。上海奶协可称为代表，在上海，奶牛养殖主要在崇明岛，规模化科学化都有了稳定的保障，这使得上海的奶源质量甚至不输于新西兰这样的国家。

至于是否应该一味的与国际标准看齐，记者采访的十多名食品标准专家

中，几乎没有一位同意将标准迅速提高到 CAC、欧盟或者日本标准。这中间的理由包括贸易壁垒、产业完善需要过程以及背后的国家利益等。但主张标准要有适当的前瞻性和引导性，是共识。

另外的争论，就是企业该不该参与标准制定，笔者查询了过往的旧标准发现，企业参与制定标准，早有先例，并非此轮新创。支持者认为，大企业一般而言在行业内掌握新动向，新趋势，对产业的发展有发言权，反对者的观点则认为，中国这些大企业的纯洁性和公共取向值得怀疑，且三聚氰胺的教训历历在目，他们的诚信如何经得住考验？

所有的争议其实都无可厚非，无论是降低还是提高，无论是大企业参与或不参与，最重要的主管机构以及评审机构，应有充足的能力和数据来辨别是非，分清缓急，最后达成平衡。

但综观标准清理和重塑的过程，这一环节似乎是最孱弱的。早年参加过多项标准制定的一位老专家回忆，过去主持乳业标准制定，相关部门之前都要在全国东南西北选中 5 个城市的卫生单位及企业，每年根据春夏秋冬的季节变化，采样分析数据，进行统计学的处理，最后提出项目指标。

而这一次，因为重在梳理和归并整合，且领衔单位卫生部不分管奶源，基础数据的准备工作并不充分，遂造成了各种

意见，各怀动机，各自为政。

科学的数据，全局的调研，一线的摸底缺乏的情形下，最后的拍板就难免是表面的权衡利弊，在民生，在安全，在消费者，在奶农，在企业的声音中，无从取舍。

食品安全标准的清理工作繁重而复杂，利益博弈、企业参与，其实都不是问题的关键，或者说都是常态。最重要的是，在一个标准重新修订的同时，是否对相关产业的数据，现实，问题的症结，有了最切实的调研和科学的数据来支撑。而这项工作无疑是更为庞大和浩瀚的，但别无他法，也是无法跳过的。

中国的食品安全安全标准，当然要尊重中国的国情，但这个国情只应该有一个，就是最真实的中国现实。🌀

朱红军 《南方周末》编委，绿色新闻版块总监

牛奶传统生产与现代经营的困局

● 文 / 舒泥

编者按：内蒙古天然牧场的牛奶不能进入大企业生产流程，奶牛村持续破产，经营人数和奶牛数越来越少，但企业的产销量在攀升。舒泥在草原牧区深入调研，告诉你大企业的牛奶是怎么来的。

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牧民格日勒图雅的家，距离最近的公路边有1公里左右。从公路到锡林浩特市有200多公里，那里有牛奶加工厂。离她家最近的两户邻居，都至少与她相距1公里。正蓝旗牧民蓝图，以养殖奶牛为主要收入来源，他的家距离公路有8-10公里，从公路到镇上还有10公里。克什克腾旗牧民阿拉腾苏布达的放牧点距离公路8公里，距离旗政府150公里左右。

从数字可以看出，这些在草原上养牛，每天一早、一晚挤两次牛奶的牧民家，在方圆几十、上百公里内，没有机械化挤奶站，他们生产的牛奶也不会进入工厂变成盒装液态奶。

如今大型乳品企业收购牛奶都有一

个基本的要求，就是挤奶过程要无菌操作，即在专业的厂房中使用机械挤奶，不接受手工挤奶。奶牛每天一早、一晚必须被牵到奶站。

那么这样的挤奶方式需要什么样的奶牛饲养条件呢？在包头，我们见到了一个奶牛大户。卡车司机张师傅家住在包头市郊，距离包头市区很近。他家有一个挤奶站。

张师傅曾经在做运输时挣下了两百万家产，后来赶上“奶牛热”，就投资养奶牛，建奶站。有了奶站，周围的奶农也都到他家挤奶。他们的奶站接近大城市的牛奶厂，运输成本相对低，比较有条件盈利。这些奶牛养殖户集中在小镇居住，远离大草原，使用玉米秸秆

和玉米粉作为饲料，来满足奶牛的营养需要。

张师傅把数年以来的收奶记录给我看，牛奶收购价上涨缓慢，这导致他们的利润空间几乎被挤压殆尽。从建立奶站以后，他们在市场中一直处于被动地位，只有蒙牛和伊利两家大型企业收购他们的奶。牛奶是容易变质的东西，每天收了就必须交，因此无力与企业谈价格。而且，收购企业拖欠奶款，他们也不能停止交奶，不然就只能把牛奶倒掉。经过几年经营，两百万元的投资已大规

模缩水。附近的奶农纷纷转产，目前这个小镇只剩下一两家了。

在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我们访问了一户陈姓的奶农。他们养牛的地方也是一个小镇，几十户村民连成一大片。

这一户坚持这一行业不到五年。经过了两年多的积累，他们在第三年盈利，第四年的时候，一场传染性乳房炎给他们的奶牛养殖业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他们不得不转产肉牛行业。他们投资四十万元新添置的奶站，还没有使用，就闲置了。据说附近村庄的奶牛养殖户



草原上的牧民在挤奶 图片拍摄：舒泥

中，只有一户挣到了钱。

内蒙古过去曾经有很多小型奶粉厂、牛奶加工场，生产的产品质量卓越。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家曾托朋友从内蒙古邮寄当地生产的奶粉到北京，那种奶粉的质量足以用来嘲笑喝雀巢奶粉的同学。

那些企业的规模都很小，资金实力也很小，只能满足当地市场，不能在区外闯品牌。但是这种企业和本地牧民结合紧密，离公路近的牧民可以每天早晚交来牛奶。另外，这些企业的检测标准也适合当地情况，当地牛出产的牛奶干物质含量高，粘稠度高，牧民们手工挤奶，本地企业的检测标准可以接受。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我们去到的大部分旗县和全部盟市，过去都有本地的乳品加工企业。如今要么停产，要么被国际大品牌 and 国内垄断企业并购。

那么天然牧场的牛奶究竟去了哪里？格日勒图雅家有二十头母牛，都是西门塔尔牛和本地牛的混血，这种牛不是专门的奶牛。每天挤奶后，格日勒图雅将牛奶自然发酵，做成奶豆腐和黄油，主要用于自家食用和赠送朋友，只有少量外销。

正蓝旗的蓝图家以做传统奶食为生。他家新买了三头黑白花奶牛。这种奶牛是国外品种，产奶量高，但是水分多。

牧民散养牛的牛奶已经不能进入大企业的生产流程。而这些奶牛村持续破产，经营人数和奶牛数量越来越少，但是企业的产销量都在攀升，其中还有更多谜团需要揭开。

蓝图说，他们的牛不能牵到奶站挤奶，一是太远了，而且奶站也不要，因为用牧民的养牛办法，即使是黑白花奶牛，出产的奶也比奶站要求的稠，所以还是做奶豆腐比较合适。包头奶站的张师傅也曾提到，要符合企业的检测标准，他们要给挤出来的牛奶兑水。

而生活在传统牧区的阿拉腾苏布达家有八十头奶牛，从四月份起到秋凉，每天早晚挤两次奶，从早晨到深夜，都要忙着做各种奶食。牛奶发酵三天后，上面浮着的白油叫做奶嚼克，可以直接吃，也可以分离成黄油和油渣，保存比较长的时间。除去油的酸奶可以做奶豆腐，挤出来的汤汁可以蒸馏做奶酒。这个工作必须每天进行，不能懈怠。传统奶食在市场上的接受程度有限，价格不高，不过这个市场在过去的十年里，一直在缓慢发育，目前当地的小餐馆和食品店都出售传统奶食，这已成为一些牧民的重要收入来源。

由此，现在的乳品生产变成了两条

平行线，一条线来自牧场上的散养牛，它们的牛奶不再进入工业体系，而是由牧民加工成传统奶食品销售。另一条线来自城市周边、道路边缘建立的奶牛村，人们采用农区方法，用饲料集中喂养奶牛，建立工业化挤奶站，把牛奶提供大企业。

大企业的崛起对草原上传统牧民的生活方式和生计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乌云花一家曾是锡林郭勒草原上的传统牧民，当年牛奶企业刚刚崛起的时候，草原上正在推行“围封转移”政策。乌云花一家响应了政策，他们卖掉了牧场上的本地牛，引进了黑白花牛，从牧场搬移到城镇边缘，为奶站提供牛奶。在2004年，响应“围封转移”的大量活牛出售，价格低到每头牛500元。而奶牛购入的价格是每头一万多元。

乌云花先后投入了全部家底，用来盖房子、买草料、引进更多的奶牛。终于在熬过没有收入的两年之后，奶牛开始产奶了，但并没有宣传的高产量。他们曾认为赔钱的原因是养殖规模不够。后来发现，黑白花奶牛容易生病，饲养工作压力特别大，当初购买的牛品种、质量也与价格不符。在三聚氰胺事件的打击之后，牛奶市场持续低迷。最终，经过多年经营仍然入不敷出的乌云花夫妇卖掉了所有奶牛，搬到城市里改做其它营生。他们是奶牛村中较晚搬出的一

户。“围封转移”以后，乌云花家原有的牧场被煤矿征用，环境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持续恶化。

经过多年在内蒙古各地调查访问，始终没有找到大企业在天然牧场收购牛奶的证据，虽然部分液态奶确实来自内蒙古，但那都是在城市边缘集中居住的村庄里，由人工喂养的奶牛生产的。牧民散养牛的牛奶已经不能进入大企业的生产流程。而这些奶牛村持续破产，经营人数和奶牛数量越来越少，但是企业的产销量都在攀升，其中还有更多谜团需要揭开。

舒泥 草原问题自由撰稿人

美国“有机山谷”的奶业合作之路

文 / 周立

编者按：美国奶制品在工厂化农业盛行的今天显现出越来越多的食品安全问题。为了得到安全的牛奶，美国民间进行了积极地探索。周立曾经考察美国农业经济，他对威斯康星州有机山谷（Organic Valley）奶业合作社进行详细的调研。这个案例讲述了一个合作社发展本地安全消费的故事。

作为资本化农业的典型代表，美国工厂化农业的道路走得很远很深，带来了深刻的经济、社会及生态影响，也带来了诸多食品安全问题。现实环境引发了社会自我保护的运动和呼声。

美国农业与贸易政策研究所(IATP)的农业政策专家 Jim Kleinschmit 在回顾自身成长变化历程时评论：“在过去 25 年中，我的家庭农场由产业化牛奶、肉类及谷物生产，转向了有机农业与草饲牛肉生产。孩提至今，我父母不断地向我及周围同胞提醒农业对社会的重要性，有责任的农夫应该保护和改善土壤质量及其他自然资源，但事实上现在的农业政策不再为农夫、环境或社会服务了。”

奶制品是美国人最主要的一项营养

来源。由于美国政府对商品化农业的支持政策，使得美国奶牛的平均产奶量和牛奶总产量不断上升，人均奶制品消费量随之上升。但人均鲜奶消费量在长期内却在缓慢下降。

奶业发展的同时，奶制品的质量在受到质疑。以促生长激素、重组牛生长激素为代表的饲养技术，使得美国平均每只奶牛年产奶量从 1998 年到 2011 年间竟然增加了 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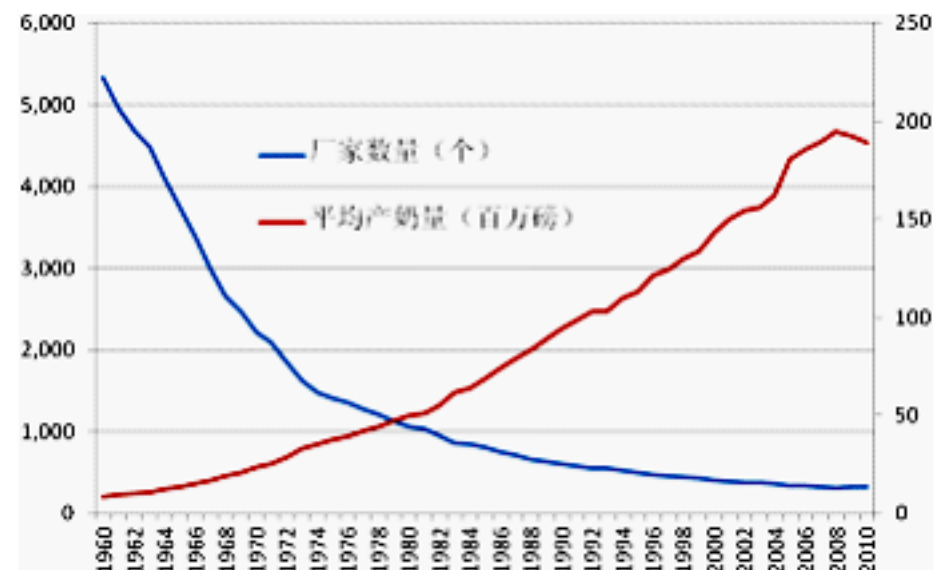
当牛奶仅仅被当作食物，奶牛被当作食物生产手段时，食物生产就脱离了基本的自然规律和自然节奏，从而对人类和动物都产生深远影响。在蒙古高原上传统放牧方式下的奶牛，只在产下小牛犊五个月内挤奶和供人类食用。而在美国产业化养

殖场内，奶牛每年要挤奶约 300 天，这就意味着大部分挤奶时间和孕产时间重叠，雌性激素含量大大增加。

来，并找出一条更好的道路，让更多农户能够维持本地化耕作，并且能比大农场和农业公司更好地生产本地化的、健康的食品。他们的想法产生了一呼百应的效果。

合作社成立不久，大家就发现了消费者对产业化牛奶质量和环境破坏的担忧，于是将运营重点放在奶制品上。他们不满

产业化奶牛生产市场的价格



美国液态奶加工厂家集中化和规模化趋势。(1960—2010) 1960 年以来美国液态奶加工厂家减少了 4996 家，占近 94%，而单个生产规模扩大了 21.4 倍。

在美国国内，产业化生产远离自然的弊端，逐渐为人们所认识。作为替代模式的天然化、本地化食品生产则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总部位于威斯康星州的有机山谷奶业合作社，满足了消费者对于安全奶制品和公益环保消费的强大需求。

有机山谷的农民合作起源于 1988 年。伴随美国农业政策的推进，当地中小规模农场面临很大难题：要么变大，要么走人（退出农作）。但威斯康星南部 La Farge 河谷一带的农民，既不想变大，也不想走人。于是，George Siemon 等 7 个农民走到一起，他们商量是否可以组织起

压榨，利用自己的力量推销有机牛奶。随着发展，不断有家庭农场加入。2007 年，合作社已成为仅次于 Dean Foods 的美国第二大牛奶生产商。到了 2010 年，他们的销售额达到了 5.55 亿美元。

有机山谷包括经营主管在内的高级员工很自豪地告诉我：“我们有一千个老板。”虽然处在一个迅速成长的经营实体里，但大家很清楚他们是农民的代表。2007 年初，有机山谷在全美 24 个州吸纳了 1056 个会员农场，达到全美有机农场的 10%。到 2012 年，已有 1723 个农场会员了。

有机山谷介绍：“家庭农场和合作社这两个模式，都在向社区保证，我们可以提供被公司模式拿去的有益于社区健康的、自然的、富有营养的本地食品。”合作社最初由当地的小规模家庭农场组成，后来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农民合作组织。至今，合作社只面向中小规模农户，拒绝吸收产业化的大农场。由于小规模农场地域分散、产量较小，经营弹性很大，合作社建立了牛奶集散体系和规章制度。

在规章制度中，合作社制定了一些所有农民必须遵守的规则。例如，在奶牛食物构成中，要保证 80% 以上是青草；要保证把所有的有机产品以董事会最终决定的价格卖给有机山谷等。由于有机山谷

的奶农，都是小家庭农场，最大的养殖规模，都不超过 500 头奶牛，所以，自觉自愿的遵守规章并长期合作，是有机山谷成功的关键。这也是首席执行官 George 将相互依赖、相互忠诚的农民，作为其事业成功最核心因素的主要原因。

如果市场价格有波动，农民仍然会按照约定，获得已经约好的价格。这个规定使得因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发生的价格波动，都由合作社进行风险共担。农民只需要尽好自己的本分——提供保质保量的牛奶即可。

由农民董事会决定的有机山谷产品价格，总是大大高于市场价格。在制度设计的开始，有机山谷的开创者就试图建立

并遵循一个经济可行的定价原则，既让会员农场收益，又不至于无力承担过高的原奶收购成本。说服消费者对天然的有机牛奶付出一个合理的公平价格，并减少产业链环节以节约流通成本，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最终，他们依托有机产品的高认可度得到了较高利润，制定了远高于一般牛奶的价格。20 年之后，他们与波幅震荡的工厂化牛奶相比，保持了价格的稳定上升，将有机奶和工厂化牛奶的价格差距，由 1989 年的 2.1 美元，扩大到 2010 年的 7.1 美元，所有的牛奶产品都达到了合理的公平价格。

实际上，有机食品和本地食品的消费市场，是需求创造出来的。保证原材料是本地的有机食品，是第一要素，其次，进行适度选配加工和品牌化达到不断的价值增值。经营收益的大部分最终返还给会员农场，或留作合作社长期发展。因此，价值增值，又进一步支撑会员们对合作社的参与信任，促进合作社不断扩大。

有机山谷在合作社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一些困难。例如当机构迅速壮大时，人们对庞大数量的农场管理以及由此引发的奶品质量产生过忧虑；合作社控股公司经营，带来股份制对合作制理念的冲突；以及管理与收益分配原则的挑战等。但人们看到，有机山谷不仅迎接了这些挑战，而且，这种农场合作社的产业模式，创造了一个新的、替代性的市场，让美国的消

费者在奶业发展危及食品安全的时候，通过公平的价格支付、有效的合作组织和替代产业链，形成了一个消费者与本地合作社联合的短产业链市场，为政策制定和公众消费，都提供了新的选择。同样，也对处在丧失社会公信力的中国奶业提供了启示。

周立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有机山谷的会员增长与牛奶支付价格（1989—2010）注：CWT 为英担，英制为 112 磅，美制为 100 磅。（图片：有机山谷报告 Harvesting Growth at Organic Valley）

挑战常识的现代食品供应链

文 / 吴晨

编者按：面对中国此起彼伏的食品安全问题，吴晨分析了食品供应链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从食品科技、经济体系、社会文化等方面诠释问题的根源。

在中国，食品安全如同水缸中的葫芦，无论你怎么发力，总是沉而又起。当我们试图对葫芦进行严刑拷打时，也需要考虑水，即承载体的哪些特征造就了永远沉不下去的葫芦。食品供应链就如同水缸中的水，其自身满含张力，食品安全只是其溢出的最容易被媒体和消费者追逐的热点问题。而诸如底层农户缺失谈判能力和地位、食品企业非法劳动用工等，同样凸显了中国食品供应链的特征，并与食品安全问题产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食品安全问题古已有之。唐代著名文学家柳宗元曾经为了治疗消化不良，遵循医生的建议服用茯苓，结果在市场上买到了用芋头伪装的假茯苓，导致病情加重，辗转一年才治愈。

但是，食品安全能够在一国范围之内演化到“谈食色变”的程度，需要两个前提条件：其一是食品供应链的日益复杂，其二是化学农业的介入。

在柳宗元的年代，食品供应链更多是一个极短的自循环体系。由于农作物产出有限，除了皇族和“公务员”能够一定程度上脱离农业生产之外，大多数人被困于农地之中，同时生产和消费种类有限的主粮、蔬菜和肉类。即使是在市场交易达到顶峰的宋朝，城市化比例在20%左右徘徊，社会从业者的主体仍然是自产自食的农户，在有限的市镇交易中，食品的交易在熟人社会中发生。很显然，武大郎卖的炊饼，其消费者仅局限在对面楼的王婆、武松在衙门的各同事，以及清河县政

府所在地的其它居民之中，这决定了武大郎只能卖“良心炊饼”。因此，专制社会的“食品安全”是一个真正的贵族问题，只有皇亲贵胄才有能力动用全国的交通资源来运输各地美食，为自己的嘴巴服务，他们也因此需要承受陌生人社会的不确定风险。但解决办法很简单：特供，以及基于专制权力之上的严刑峻法，动辄便以狗头铡伺候。

当越来越多的人脱离农业生产之后，这一般也是我们所认为的“现代化”的必然结果，食品供应链的自循环体系和熟人社会特征被完全打破。而之所以更少的农业从业者能够养活更多的非农业人口，我们认为这是化学农业获得的巨大的短期利益。从此，有更多的农产品可以进入深加工环节，不仅贡献于工业生产，也极大地丰富了人类可摄取的食物种类。因此，食品供应链不再是从小麦到馒头的“常识

性”问题，而是从非洲可可树到M&M巧克力豆的复杂“知识性”环节。而从常识到知识的转化，也就意味着必须经过专门培养，只有一小群人能够清楚阐释和操作食物转化的奥秘。

至此，食品供应链走完了自己漫长的进化阶段，它的每一步成长都与农业经济的变迁他社会的转型密切相关。种植者不再扮演一个关键的“试吃”角色；供应链从非洲的种植者延伸到中国本土超市；加工环节日趋复杂，为消费者带来过多的不确定性。而这些，和社会中弥漫的不信任感叠合在一起，促成了今日中国食品安全的乱局。

可见，食品安全问题需要被分解为“质量达标”和“消除不确定性”两个层次。前者类似“吃了这东西的确没有死”，后者类似“我相信自己吃了不会死”，是一种食品安全感。在一个食品安全感强的



某禽类加工企业的产业链 图片：zgjq.cn

社会里，同样会发生食品安全事故，但不会发生“自己买羊，自己挤奶给孩子喝”的事情。

为何中国人的食品不安全感会如此之强？可归纳有二：其一如上所述，供应链加工环节复杂，

已经超出常识的范围，人们对于未知事物如复杂的添加剂有强烈的不确定感。其二需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曾经有人说日本人有

极强的食品安全感，因为在他们的社会里，每个人都极认真地对待自己的工作，因此推己及人，也就相信食品工作者同样一丝不苟。姑且不论这个段子的真假，但提供的观察视角相当有益，中国社会中的“混日子”文化，“得过且过”，“跟着感觉走”，需要我们从每个人身上找根子。因此，提升国人的食品安全感，要从薄弱的科普教育着手，从食品科技的角度来普及工业生产中所使用到的各种添加物质。而不是等到问题发生，才有专家出来澄清。

现在，一些城市白领和民间组织业已开始尝试“社区支持农业(CSA)”的模式，其实就是重建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直接联系，再造熟人社会。这无疑是极好的尝试，但由于受价格、产品种类以及物流限

制，只能成为一部分人解决食品问题的可选方案。

对于大多数消费者而言，保证现有食品供应链中每一个环节的质量达标，才是力所能及的解决“质量问题”的方向。

种植者不再扮演一个关键的“试吃”角色；供应链从非洲的种植者延伸到中国本土超市；加工环节日趋复杂，为消费者带来过多的不确定性。而这些，和社会中弥漫的不信任感叠合在一起，促成了今日中国食品安全的乱局。

如何去监察每个环节中加工者的行为，这需要政府投入人力和财力，提出切实可行的行动方案。而消费者承担的则是对政府问责的作用。事实上，目前消费者并非缺乏问责的意愿，而是缺乏强有力的问责途径和保障。其次，如何在中国引入“惩罚性赔偿”，这也是消费者与食品企业的游说力量抗衡，争取法律和政府支持的过程。

我们可以采取多个角度去分析食品安全问题，例如从农户和工人在供应链中所处的不平等地位，来论述农产品种植和加工环节的质量安全，但只要最终落脚在解决方案上，无可回避的就是政府是否能够承担应有的职责，无论是对食品企业生产的监管，还是保障消费者、车间工人、农户的合法权益。

我认为，在食品安全问题之下，所有在中国生活的人们，无论你是否享受特供，终有一天你或你的家庭都将会受累于充满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中国问题食品。而

任何一种焦虑，都不会强过对食品安全的焦虑，这不仅关系成年人自身，也与中国人最看重的子息绵延紧密相关。网络间流传的关于食品体系的种种黑色幽默，既可以读出被调侃的悲凉，也可以视为一种等待出口的被压抑的愤怒和不满。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在食品供应链上游从事种植、畜牧的小规模农户将逐渐通过土地兼并和租赁，化身为规模农户和企业自有农场中的工人，这个趋势在中国的东北、山东、安徽、江苏等地已经出现。这带来两个结果，首先是部分农户被挤出农业生产，需要在城市中寻求工作机会，依赖于市场交易来获得食品，这些人将多居住在三线城市和市镇，属于食品监管的薄弱区。因此问题食品的潜在受害者数量将增加；其次是政府一再强调的由于源头过于分散而导致的食品监管难题，将由于农业生产模式的转型得到极大缓解。政府可以通过补贴的形式，建立完善的企业产品追溯体系。在食品供应链全程透明的前提下，配合惩罚性赔偿和消费者压力团体的形成，食品安全这个葫芦，才能最终沉入水底。

吴晨 社会资源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中国食品药品安全问题根源何在？

● 文 / 唐昊

编者按：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生活。中国的食品药品安全不仅是一个经济结构问题、行政监管问题，更是政治法律体制问题。如果缺乏全局性的制度改革，只是盲目加大执行力量是没有用的。唐昊分析。

中国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近年来日新月异，极大地挑战了人们的想象力。在过去的十几年间，甲醇制酒事件、福尔马林浸泡海产品问题、阜阳奶粉问题、苏丹红事件、三聚氰胺事件、地沟油问题、食用明胶问题等等，层出不穷。到现在连缓释药物的胶囊也查出有毒。从儿童奶粉到食用油，整个社会无法保证任何一种食品药品是安全的；从小作坊到国有大企业，整个社会也不能保证任何一个企业不去制造有问题的食品药品。而对消费者来说，从最初看到这些新闻的“触目惊心”到今天变成了“基本麻木”，中国人似乎不得不习惯于这种“相互投毒”的生活。

中国食品药品安全问题之所以蔓延到今天这样，形成在全行业、全领域广泛存在、难以收拾的局面，首先是因为问题本身的特性——中国的食品安全是一个结

构性问题。所谓结构性问题，即其形成过程是由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合谋、问题本身也受到制度性鼓励。这样的问题不能指望通过一个事件的刺激，针对某一个环节就可以解决。

首先，从食品安全问题的经济源头来看，我们必须问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为什么企业会生产和使用有毒食品药品？即使是那些经正规注册的、甚至已经有了相当规模的企业也是如此？这实际上关系到整个经济结构的问题。在中国，象能源、重工、化工、通讯等产业一般都是高利润行业，这些行业存在着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以保证国有垄断企业的利益。在这样的经济结构中，能够留给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进入的领域并不多。而过多的企业进入有限的领域，也导致这些领域达到过度竞争的状态。对食品医药等行业来说，由于

进入的资金技术门槛低，企业多呈现小、散、低的结构性缺陷，创新能力不足，就只能在歪门邪道上想办法。在因过度竞争而导致的“比坏”竞争格局已经形成的情况下，通过假冒伪劣来降低成本就成为常态，而那些关注食品安全的企业反而会失去竞争力甚至被劣质企业淘汰出局。

不仅市场过度竞争会带来劣币驱逐良币的效果，食品药品企业还面临着国家税收等巨大压力。各种各样的税费，包括正常但比其他国家更重的税收、路桥费、工商管理费等仅在中国才大规模存在的额外费用等，也将食品经济链条的利润压缩到最低。在某种食品药品最终能够被消费者使用之前，从原料运输、生产、流通、销售等环节都产生了极大的附加成本，使得生产和销售企业的税收负担极重，无法做大做强。在食品药品市场生产供应链日趋复杂，市场开放性日趋增强的情况下，这些环节的负担最终都会以正常（涨价）或者违法（制造价低但有毒的产品）的形式转嫁到消费者身上。所以，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食品安全都着重于在农

食品药品安全不仅是一个经济结构问题，也是一个行政监管问题，同时更是一个政治法律体制问题。在此种结构性问题的治理过程中，如果缺乏全局性的制度改革，只是盲目加大执行力量是没有用的。

场、工厂的源头监控，而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则可能发生在各个环节。

其次，从政府监管层面来看，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政府保持对市场的介入，中国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不断增强，但管治能力却在下降。近年来中国食品安全管理在立法层面成就显著，《食品安全法》、《药品管理法》、《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等相继出台，一系列国家标准也大部分跟国际接轨。但这些越来越细致的法律却并没有改善国内食品安全日益恶化的现状。根子出在执行环节。内地负责食品安全的部门很多，权责过于分散：卫生部起综合协调作用并进行风险评估；农业部负责农产品；质检总局负责进出口以及监管生产加工环节；药监局管药品；流通的食品主要是工商局监管。多头监管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在没有出问题时交叉管理，增加企业成本；二是在出了问题时互相推卸责任，谁都不管，即有人捞钱、无人负责。而两者都造成食品药品质量安全风险加大，安全难以保证。十几年前朱基访问美国期间，重点视察的一个单位就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这个机构在享有食品药品监管上的超级权力，在美国存在了100年以上。朱总理回国后成立了一个类似的安全食品药品安全统一监管机构，但由于种种原因最后无法发挥作用而被迫撤并。

在顶层设计存在重大缺陷的情况下，基层执法环节的问题更加严重。已经出台

的法律和国家标准一般都得不到严格的执行。执法第一线的基层人员不但缺乏严格执法的动力，甚至在监管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双向代理”的潜规则。即基层执法人员不但代理国家法律，而且也代理不良商家的利益。国家法律成为基层官员向不良商家索取利益的依据，而对这些利益的回报就是放松或根本不执行国家法律。这些利益索取对商家当然是额外的负担，但商家会把这多出来的负担通过假冒伪劣商品转嫁到消费者头上。在这种“双向代理”的过程中，基层官员实际上成了整个劣质食品产业链中间的一环，分享其中的利益。自然不可能采取消灭劣质食品这种自杀式行为。类似的情况不仅出现在食品药品行业，在南方某些城市如北海南宁的传销行业、珠三角的色情行业总是禁而不绝，在很大程度上与一些地方基层管理人员有利益掺杂其中有很大关系。在这些“双向代理”盛行的领域里，政府宗旨和目标并未被基层官员所执行，由此形成了治理失效。而更加恶劣的情况是：在“双向代理”已经根深蒂固的情况下，单独加强某个领域的行政管制，实际上是加强了这个领域内的官员向商家勒索的能力，形成了反治理的效果。即财政投入越多，行政管制越强力，治理就越失败。

最后，从消费者和社会监督的层面来看，由于中国特有的政策法律环境无法适应现代社会公民政治的需要，以至于在现

实的社会生活中，媒体监督与公众参与受到限制、民间监管组织难以行动、行业协会的自律机制不发达、公众对食品药品企业的诉讼遭遇司法瓶颈等等，使得食品药品行业缺乏来自社会监督的压力，丧失了最后、最直接的一道防线，由此导致安全问题愈演愈烈。

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生活。在这个意义上，食品药品安全不仅是一个经济结构问题，也是一个行政监管问题，同时更是一个政治法律体制问题。在此种结构性问题的治理过程中，如果缺乏全局性的制度改革，只是盲目加大执行力量是没有用的。而如何通过经济、行政、社会、法律的渠道改变这种不良的制度结构，则需要直接受害者——作为消费者的公众对这个问题更深入更持久的参与，并且必须要将这种参与扩大到加强食品药品监管执法之外的其他所有的环节中去，如要求经济公平、打击垄断、扩大市场准入；启动责令停产、追究刑责、索求惩罚性巨额赔偿举措；追求司法独立、完善法律法规、扩大司法诉讼、推动法治进步；开展公民运动、建设民间组织、推动政治改革等等。只有全面的参与、全局的改革才能指望问题的全面解决。这当然是一条艰难的道路，但对于一个结构性问题来说，没有捷径可走。☞

唐昊 华南师范大学副教授，富布莱特学者，专栏作家

食品体系中的四方博弈和角色失衡

文 / 周立

编者按：周立认为，伴随人类食物供应由短缺向过剩的转变，食品体系从“生产者+销售者”的两主角博弈，转换为“生产者+销售者+消费者”的三主角博弈，再由于食物市场失灵，食品安全事件频发，政府借入，形成四方博弈的格局。在这一演变过程中，四主角角色失衡，劣币驱逐良币的食品安全危机不断深化。

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期处在食物短缺状态。在短缺时代，食物体系中只有两个主角——生产者和销售者，此时的食物市场是一个纯卖方市场。但食物相对过剩后，消费者作为第三个主角出场了。消费者以其手中的货币选票，很快使得销售者（此时已是中间商）易帜，由讨好生产者转向讨好消费者。因为中间商很快认识到，此时稀缺的不是生产能力，而是消费能力。是消费者，而非生产者，将他们手中的商品转化为了货币财富。

食物体系中，生产者、中间商、消



图片：xmlasp.net

费者力量的极度不平衡。生产者和消费者极为松散，而中间商组织力量很强。组织的极度不对等，使得中间商很容易对上（生产者）欺，对下（消费者）骗，扩充自己的利益边界。因为在普遍的食品消费过程中，消费者无法了解整个食物消费对自身健康带来的潜在影响，只能根据食物消费可观察和可体验的部分，做出消费决策。并且大多数消费者只愿意支付这两部分的价格，不愿支付如长期健康影响等不可体验部分，和与自己没有直接关系的那部分价格，即食物生产的生态、文化、社会影

响及农业多功能性等。于是，消费者在寻求质优价廉商品的过程中，对食物消费做出逆向选择。

生产者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本来就具有食品生产的道德风险，消费者的逆向选择和中间商的上欺下骗，产生了负向激励，促使他们进行违背质量安全目标的食物生产。食品安全问题的市场失灵就会出现。一个明显的现象是，整个食物体系的定价不是由消费者决定，也不是由生产者决定，而是由中间商控制。质量标准实际上是在行业内掌控的，潜规则流行与这样的食物市场结构直接相关。因此，在这种市场体系下的食物体系，必然出现食品安全问题，带来市场失灵。

在食品体系结构两端力量松散而弱小，中间力量独大的不平衡条件下，第四个主角——政府出场了。高度组织化的政府若能选择一直站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一边，与同样高度组织化的中间商形成抗衡，食物市场的组织结构可能就平衡了。不幸的是，在全球范围内，至今还很难找到一个政府，会完全自觉地站在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那一边。因为政府的组织特性及其官员的私人目标，常常与中间商相一致。在利益至上的社会形态中，世界机制的表现形态，几乎是清一色的强强联合，而非强弱联合。

政府在中间商与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居间调和角色，往往是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协助中间商做上欺下骗的工作，将短期

食品安全事件压制住，转化为长期食品安全危机。“亲资本”体制的普遍形成，使得政府的介入，常常又加剧了结构失衡，进而导致政府失灵。两大失灵，使得食物体系“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成为全球性问题。

在食物体系四主角中，最需要考虑的是消费者社会责任。要创建一个健康的消费环境，消费者首先要打破“质优价廉”这种“鱼与熊掌兼得”的消费幻想。只有这样，才能创造一个公平、健康的消费环境。虽然消费者的观念在铺天盖地的广告宣传、价值重塑下，已经被严重扭曲了。但消费者社会责任是源头，只有消费者成熟了，愿意履行社会责任了，才能为政府社会责任、企业家社会责任的履行，以及生产者道德风险的舒缓，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解救食物体系的对策要从认识论出发。需要认识粮食至少是生存必需品，而非仅仅换取货币的商品，重新把粮食当粮食，认识粮食的多种基本属性并且保有它的基本属性；明白农业是个公共部门，而非单一的产业部门，不再进行不同农作制度之间、工农业之间的不公平竞争，才有助于“劣食品驱逐良食品”状况的缓解。这是每个人应有的常识，也应是国家制定各项涉农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周立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食品监管，等待第三方来拯救？

● 收集整理 / 张春

编者按：在中国食品监管体系逐步完善的同时，技术监管能力的不足愈发暴露。第三方监管能否延续国外的经验，走进中国食品管理体制？张春根据食品管理研究整理成文。

中国分段管理的食品监管体系存在许多监管漏洞，国内食品安全问题频发，政府公信力下降。让具有独立客观特质的非政府组织和第三方认证机构介入监督，是新的发展需求。

在监管体系清晰健全的欧美国家，政府主管立法和行政，而将大部分技术参与放权给市场和非政府组织。中国则不然。

中国长期实行政府监管为主、市场监管为辅的监管模式，监管职能主要分布在卫生、农业、粮食、质检、药品监管及环保等部门，兼顾立法、行政和技术，以分段形式实行全产业链监督。众多专家学者指出，这种监管方式导致的权责不清、覆盖空白和责任推诿现象长期存在。部门间协调性差，管



图片：国际在线

理缺口很多。

2003年以前，中国实行卫生部门主管、相关部门配合的食品卫生监管体制；2003年以后，监管重心逐渐分散

到卫生、农业、质检、经贸和工商等部门；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出台，卫生部成为食品安全监管牵头部门，分段监管的综合协调性加强。

经历了上述三个主要发展阶段，中国食品安全监管系统性得到增强。2010年成立的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以国家高层议事机构的形态，再次强化了监管的统一性。

在新的食品安全监管格局下，地方政府建立协调议事机构，综合协调和权责分明的监管从基层开始形成；卫生部在制定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制定、风险检测评估、

食品检验规范、重大信息等方面的职能，也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分段监管权责不清、交叉及空白的问题。

然而，监管能力，尤其技术监管不足，仍是不能回避的硬伤。

卫生部副部长陈啸宏在去年5月国家行政学院“加强食品安全监管”专题研讨班所做报告中表示，国家层面，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和单独的食品安全标准管理机构尚未建立，标准管理人员不足；地方层面，综合协调机构在信息报告、企业标准备案、突发事件应急处理以及食品安全事故查处等方面人员不足、权威性不高；农村和基层监督人员不足、素质不高，监管资源配置低下。

在欧美国家，独立高效的第三方检测认证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弥补了这类不足。同时，第三方的参与，也有利于市场的自我更新和维持。已故中国首位食品安全律师桑立伟曾撰文指出，美国食品安全监管体系下，“同行业的竞争对手则成为了彼此最自觉的监管。”随着食品产业链的全球化，常规监管模式不再适应新的流通需求，美国于2010年推行《FDA 食品安全现代法》，首次对进口食品安全监管引入第三方审核制度。

部分第三方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具有丰富的食品安全检测技术和强大的食品安全标准检查能力。这类机构已成为欧美食品安全的技术监管主体。

而在中国，食品安全的技术监管机构隶属于各监管部门，资源分散、效率低下，并且妨碍国际、国内第三方的本土发展。企业自主引进第三方检测的做法在国内才起步。今年6月14日，深圳旺泰佳农产品公司与第三方检测机构F.Q.T农产品检测中心签约建立长期合作关系。F.Q.T检测中心是商务部流通产业促进中心与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发起的，此次农产品生鲜流通配送龙头企业与第三方机构的合作，据报道为全国首例。

但是，也有专家指出，中国第三方机构的资质和独立性尚无保证，部分第三方机构具有很强商业性。

今年3月，第三方检测机构CER (CER Reserch市场调研机构)发布检测报告显示，雅培 (Abbott) 奶粉不符合国内奶粉标准。双方就此展开论战，最终未能形成一致意见。众多有影响的媒体进行了跟踪报道。

由于CER没有在中国国内注册备案，其身份和可信度无法确认。这种论战和媒体参与造成的信息谜团，让大部分消费者难以判断和抉择，引起全国范围的民众恐慌。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吴景明近期接受《法制日报》采访时建议，第三方独立调查机构的设立、组织结构、运行方式、调查程序、结果发布等亟待立法规范。

张春 中外对话北京办公室助理编辑

中国消费者与农民尝试建立健康关系

文 / 尹春涛 周维

编者按：对于“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的参与者来说，“有机”并不是一纸认证机构的证书，而是消费者和农户之间情感、信任、支持、分享等价值的互惠关系。

在成都“绿心田”每月组织的农友饭局上，宁静柔和的背景音乐中，陈霞轻轻念诵着一段感恩土地的颂词，带领参与者做一个简短的餐前感恩仪式。之后，大家一边品尝农友带来的生态农产品，一边听农友讲述他们和土地的故事。

这是成都市一家由城市农产品消费者组织起来的民间组织，农友饭局是消费者与农产品生产者的定期聚会。陈霞是成都“绿心田”的发起人之一，她由关注身体和心灵，进而关注食物与健康。2007年，她曾与两个

朋友组织有机小市场，之后注意到自发保护河流和土地的安龙村，成为安龙村农产品的购买者，最后参与发起成立“绿心田”。

“绿心田”的另一位发起人夏路曾经是一个民间组织在安龙村的项目协调员，项目结束后，她留下来，成为安龙村的朋友、志愿者和消费者。她想为安龙村农友和城市消费者搭建一个网络平台，组织消费者寻访农友，举办农友饭局、农友市集，让农友与消费者建立情感联接，帮助更多的农友和乡村恢复健康的耕作方式。夏路的这一想法在关注安龙

“土地已经受不起更多的伤害，它需要我们用心照料，帮助它恢复健康，健康的土地才能生产出健康的食物，也才能滋养健康的身体和心灵。”

村农产品的朋友中得到积极的响应，“绿心田”由此诞生了。



“绿心田”的宣传画布

渐渐地，参与的消费者越来越多，大家的初衷很简单——找到安全而健康的食物。而安龙村自然生态的农耕方式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在当下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尝试购买安全的农产品。张鸣是《成都日报》记者，因为采访安龙村成为购买者，之后又加入了“绿心田”。

一些核心消费者成为农户们的朋友，还志愿承担了组织和配送任务。陈霞说，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帮助消费者生发出对土地和农友的情感，增进消费者与农友的了解和信任。

除了饭局，“绿心田”还组织团购、举办市集，以此方式支持农户产品的销售，让农户的生态农耕没有后顾之忧。如今，与“绿心田”合作的农户已遍及成都周边

郊县十多个点，核心消费者 100 多位。

这种从消费者出发关注食品安全和农业的行动，最早源自日本，被称为 CSA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2003 年，社区伙伴（简称 PCD）与美国可持续贸易与政策研究所（简称 IATP）先后将 CSA 理念和经验引入中国，被称为社区支持农业。它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思考食品安全、三农问题、生态环境恶化、城市生活异化等问题，同时也开启了另一种生活选择的想象与可能性。在本土探索与外来经验的碰撞下，和食品安全问题的逼迫下，CSA 的理念和模式在中国一些城市落地生根，成为一些消费者获得安全食物的方式之一。



“爱农会”的农户家贴着“土生良品”的宣传画



在乡村探访农户的“爱农会”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早在 2003 年之前，广西柳州有一群城市消费者因为爱去农村玩、爱吃农家菜，而开始切身感受传统农业的衰落和小农生计的艰辛，于是创办社会企业“爱农会”。他们组织城市人下乡吃农家饭，共同采购农家土产。

本地农家菜好吃，食物有原生的味道。吃过的人会这样说。在与“爱农会”建立联系的农户家，吃到的米饭是房后水田里的稻鸭米（水稻和鸭子共生种养的生态农耕方式）。农户种植的是世代流传的传统作物。这土生土长的农产品不仅使农户摆脱了商业模式的束缚，还吸引了消费者。

而 CSA 模式的兴起让农民看到生态农业的技术和市场中，可以有更多自主选择的空间。而转基因或产业化模式中，农民只能成为产业链条中最末端的环节。

随着消费者的不断增加，“爱农会”在柳州开设了“土生良品”传统农耕博物馆，并壮大发展，开办了“土生良品”饭店，专门制作健康生态的农家饭。

饭店成为农村生产者和城市消费者对接的平台。它传达的信息，它展示的精神，比美食的内涵更多更深。它致力保育日渐消亡的传统农家品种，支持小农多元经济，保护小农农耕文化和促进城乡互动的发展。爱农会用稳定的价格收购合作农

户的产品，还建立“爱农基金”支持农户，鼓励他们继续种养传统土品种，自我组织，带动农村中的合作和互动。

近三年来，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与生产者开始了跨越商业市场的合作尝试。在中国许多地方，有消费者创办的有机商店、定期组织有机市集、建立配送点或代售点、共同购买……以不同的尝试实现消费者与农户、农场的对接。与商业市场不同的是，这些平台也开展各种消费者倡导活动，甚至组织消费者与农户的农产品议价活动，促进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

北京有机农夫市集最初由几位消费者发起，从2010年开始举办，影响日益扩大。现在，每次市集的消费者能够达到两千人，商户包括20家农户、农场和10



“小毛驴”农场上干活的人们

多家NGO、手工作坊。市集上不仅能够找到各种农产品，还有天然手工日用品、加工食品等。

参加市集的农产品大部分都没有认证，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依靠交流取得信任。参加市集的每一家商户由市集核心志愿者组成的监管团队定期走访，查看土地，实地交流，以此确定商户的资格。目前，市集已经从开始时的每月一次，发展到每周一次。

除了北京、上海、广东、广西、四川等许多省市地区都繁荣着民间有机农业交流。

对于这些CSA模式的参与者来说，“有机”并不是一纸权威认证机构的证书，而更多体现在他们之间超越简单的买与卖，包含情感、信任、支持、分享等价值的互惠关系。

与“社区支持农业”消费者



“小毛驴”农场上，包地的人们在劳作

一样，生产者也在为建立双方的信任而努力。在四川安龙村，并非每一个想定购农产品的人都能成为他们的消费者。安龙村的生态农户对消费者有严格的挑选。村里负责配送及联络的高一程说：“订购我们的菜，一定要先到我们的地里看一看。如果一次都没有来过就要订菜，我们会坚持暂不配送。”他们坚持，买卖之前的产销见面是非常必要的。

山西永济农民协会自08年以来便以农民合作社的方式探索发展生态农业，吸引了不少商家，但他们更看重本地消费群体的建立。负责人郑冰说，这样更有利于与消费者建立密切的联系和信任。

当代表了企业投资和商业运作的“有机”、“绿色”越来越多地走进超市，走向大品牌的时候，“社区支持农业”的参与者们却用另一个概念诠释他们的追求——自然与健康。

在一次有关乡村发展的交流会上，当在座专家和NGO代表为“有机农业”实现市场规模而一筹莫展的时候，来自河北衡水的农民安金磊说：“作为农民，‘有机’这个词让我有些反感。当这两个字成为时髦用语，也就

渐渐失去了灵魂。城里的有钱人可以开着车到超市中购买‘有机食品’，他们关心的只是一己之健康。而他们过度消耗资源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却让整个世界更不健康。”他更愿意称他的耕作方式为自然农业，以自然之道照料土地。他说：“土地已经受不起更多的伤害，它需要我们用心照料，帮助它恢复健康，健康的土地才能生产出健康的食物，也才能滋养健康的身体和心灵。”

现代农业恰恰在很多理念上违反了自然规律。因为看到这一问题，10年前，安金磊从国营农场辞职，回到家乡承包土地，和妻子探索自然耕作的方式，帮助修



城市消费者在小毛驴农场包地种菜

复受伤的土地。在他看来，即使是害虫也应有生存的空间。“如果人们不改变对土地掠夺性开发的态度，农业的发展就只能是一条不归路。”他说。因为他的坚持，曾经消失的鸟儿虫儿回来了，他的棉花和

玉米被制药公司高价收购，农产品被北京多个“社区支持农业”消费群体订购。

然而，令安金磊略感遗憾的是：在他生活的村庄，却没有多少村民像他这样做。大部分人虽然认同农药、除草剂的危害，但没办法，农民负担不起生态农耕前期的投入。没有外界的支持，让农民一下子转变成可持续耕作几乎是不可能的。

种地的农民“种不起”有机的菜，可是近年来，“城市农夫”却多起来了，一些需要生态食物的城里人开始自己动手，包地种菜。

绿之盟妈妈生活馆是一个由全职主妇成立的组织。这些妈妈们关心的议题是孩子教育和成长。2006年受到食品安全问题的触动，就开始尝试包地种菜，但因为缺乏农业技术而失败。后来她们受到小毛驴农场和台湾主妇联盟的启发，转而开始组织团购，支持用心种植的生产者，吸引了近200多人参与。

德润屋是北京城市人包地种菜“老牌”企业之一。他们在北京郊区包地建立有机小农场，自产自销有机农产品。德润屋坚持只出售有机、生态的产品，除一部分为自己生产外，还有一些来自台湾等地。有机产品商户“守土义坊”负责人王天洋告诉中外对话，其实城市包地种有机菜的农场在二三十年前就有了，但那时很少，一般都是特供菜或销售给外国人的，只在近些年突然多起来。虽然供不应求，但圈

子还不大，相对成本而言，产品的价格并不高。像德润屋，一斤有机菜才10元。

在国外，人们从关注食物和土地开始尝试“社区支持农业”。但在中国，“社区支持农业”是在食品安全问题的大背景下出现的。尽管因为商业宣传的影响和选择上的贫乏，大众消费者更多依赖“有机”标识选择食物。但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依赖“土地”选择食物。🌀

尹春涛 香港社区伙伴(PCD) CSA
农业项目兼职评估顾问，芬芳田野文化书院发起人

周维 中外对话北京办公室编辑
(图片拍摄 尹春涛 周维 袁清华)



北京有机农夫市集上的买家与卖家

北京有机农夫的志愿市集

文 / 马小超

初识北京有机农夫市集是2011年的九月底，其实也是“久闻大名”，因为在微博上早已关注半年之久。一群自许“吃货”的人做起了别人眼中的“高尚事业”。

说“高尚事业”，因为他们都是无偿的志愿者，组织起了北京近30家有机方式生产的农户和手工作坊，在周末的北京城办市集。

刚刚以志愿者的身份加入市集的时候，总是听到大家的讨论，什么天福园的苹果，米酒家的醪糟，归原的牛奶等等，听得我一头雾水。慢慢的我发现，这将近30家农商户真是各有特色，每一家一提到自己的产品都透着自豪。比如践行十多年有机方式种植的天福园，在园中已经做到内部的循环，归原牛奶的奶牛们吃的都



是有有机饲料；国仁绿色联盟是一家致力推动乡村建设和农村合作社发展的机构，他们的工作人员大都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这些学生常年扎根在老乡家里，不仅给他们带去知识，更会一起参与劳动。他们带来的产品产自哪一块土地都是可以追根溯源的。

随着在这个市集中更深入地参与工作，我发现这些组织者有着更多的想法。为了鼓励大家从事环境友好型农业，市集



努力帮助商户们解决一部分销售的后顾之忧，让更多消费者了解他们。除了每周的市集，还组织讲座，交流，农户互访和技术培训。

市集要求这些商户一定不能使用任何农药和化肥，不喂含有抗生素和激素类的饲料，不使用转基因种子，加工食品不添加化学添加剂。

说起来简单。市集上每一个摊位都是志愿者们反复考察过的。这个考察的过程看起来有点泛泛，农户的每句话、每个眼神，他们的初衷，土壤的状况，农场的环境，种植的情况等等，都是考察过程中需要关注的。虽然没有考量标准，但是这种直观的考察是我们可以把控的。并且商

户要足够开放，因为所有消费者都可以是考察人员，随时去参观和了解他们的生产方式和环境。

另一方面，市集帮助消费者找到真正放心的食物，让消费者可以和食物生产者直接对话，并且亲自去参观农场的环境和生产过程。

现在，作为一个参与了半年多的全职志愿者，我在市集上认识了很多朋友，他们有农户，有消费者，但都是同样的热爱生活！🌀

马小超 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全职志愿者
(图片拍摄 尹春涛 周维)

日本人怎样吃上安全蔬菜

文 / 陈艳涛

编者按：35年来，日本“守护大地协会”以签约会员的形式，将农业生产者和农产品消费者联为一体，消费者为了更健康安全的食物，与农民共同承担生产风险，分享收益。

2010年夏季，日本酷暑，东京等大城市的菜价随之高涨。但有一群农民，在高昂的市场菜价面前却岿然不动。他们把菜以低于市场价许多的价格，卖给了一个名叫“守护大地协会”的组织。

守护大地协会成立于1975年，最初是以杜绝有害农药，稳定供应有机农作物为目标出现的。1975年的日本，与今天的中国一样，民众对于食品安全，特别是对于农药化肥催生的蔬菜水果充满了忧虑。

当时日本进入了经济高速发展的初期，经历过战败后近30年的贫困生活，



人们对于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发展模式满怀憧憬。此时，工厂烟囱喷出的浓烟，被视为现代化的标志。在农村，日本几百年来形成的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模式被认为已经过时，城市人越来越看重蔬菜水果

水灵鲜艳的外表。种种动因之下，以大量喷洒农药，广施化肥来提高农产品出产率的“效率革命”开始在日本农村全面展开。

守护大地协会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其创始人藤田和芳出身农村，他从推车卖菜开始，帮助那些用矿物质肥料种蔬菜的农民。这些农民种出的蔬菜味道很好，却因不洒农药而有虫眼，产品卖不上好价钱。

此后，藤田的“安全蔬菜”在东京小区里的销售领域逐渐扩大。一年后，“守护大地协会”成立的时候，就已经有近 300 名农民和消费者参加了。

35 年过去了，如今守护大地协会已发展成为拥有 2500 个生产会员，91000 个消费会员，年营业额达 153 亿 2613 万日元（合 10 亿 2000 多万人民币）的庞大组织。经营业务

遍及宅配、电子商务、批发、环保住宅、直营熟食店、日本料理店、咖啡店等。

藤田先生有一个很现实的观点：光靠喊口号反对使用农药无济于事，要倡导和普及一种新的价值观，只有从小事做起，即便是只把一根没有施过农药的萝卜送到了消费者手中，都胜过空喊一百句大口号。

“我们希望能建立新的耕种流程和流通系统以及新型的消费文化。守护大地要发展，这三者缺一不可。”藤田社长告诉记者。新的耕种流程，是指尽量不使用农药、消毒剂，而使用有机肥料培土，建

设和谐的循环型农业。新的流通系统，是指以签约会员的形式，将农业生产者和农产品消费者联为一体，消费者为了更健康安全的食物，与农民共同承担生产风险，分享收益。农民则采用有机种植法提供新鲜和营养的食物。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的纽带，既保护了消费者的长久健康，也保护了农民能取得稳定的收益，最重要的，还真正使土地拥有了长久的生命力。而新型的消费文化，则是让消费者理解，蔬菜水果的外表不重要，好吃和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在 35 年的发展历程里，他们是在经历过很多波折之后，才找到了盈利模式和社会责任之间的平衡点。最初的 5 年，他们没有经营和物流经验，失败在所难免。

当时已经很少有农民不使用农药化肥，一开始农户们认为守护大地的主张是回复到原始生产状态，而且不使用农药也很难控制病虫害，很多消费者不认可有虫蛀痕迹的蔬菜。“我们想要塑造一种新的流通关系，让消费者和生产者相互信赖，农户不再因为市场价格波动而受损失，也不再因为利益驱动而制造不健康农产品，这是我们前进的动力。”守护大地协会创始人之一的长谷川先生说。

为了维护有机农业的纯净度，守护大地一方面与日本农林水产省合作促成出台新的有机农业标准，又在 2000 年 1 月向社会公开了大地经销各类农产品的生产

加工细则。10 年间，这个细则还在不断完善之中。

2010 年，因为炎热的天气，日本蔬菜价格暴涨。签约农民如果将农产品拿到市场上去卖，会获利很多。“但我们不会那么做。”签约守护大地协会的仓草会长兼总经理佐藤茂说，“暴利只是一时的，建立稳定的相互信赖的合作关系才是最重要的。”

守护大地协会和签约农户之间按自己的方式约定当年的农产品价格。正因为有机农业要比普通农业花费更多人力物力，有机农产品的价格必然会超过一般的农产品。在中国，那些打上“有机”标签的农产品都有着让普通消费者敬而远之的价格，只有少数富裕的精英阶层才能享受所谓的健康食品。在日本，守护大地协会

在发展初期也遇到了同样的困扰。

藤田会长认为解决这个矛盾的关键在于不知疲倦地宣传和引导消费者。消费者增加了，价格才可以控制在一个更合理的水平。如今守护大地协会的有机农产品在超市里，价格是普通产品的 1.3 ~ 1.5 倍，消费群体已扩大到了大多数中产消费者。

从最初 10 年在住宅区里推车叫卖，到今天建立的先进的物流宅配系统，守护大地协会一步步摸索着走过来。如今所有的农产品都可以通过电话、传真或在线订购，36 小时内送货上门。🌀

原文刊于《小康》杂志 2011 年 01 期



舌尖上的中国，成长中的烦恼

文 / 徐楠 周维

编者按：食品安全办政策法规司处长王国伟告诉徐楠和周维，公众对当前的食品安全问题了解不足，迫切需要以科学的精神予以界定。

国务院食品安全办政策法规司处长王国伟认为，世界各国食品工业所遇到的共性问题，中国国内也存在，而且将进一步暴露；中国食品产业自身小、散、乱的特性，导致人为引发问题的比例较高；同时，更要看到有些问题并不属于真正的食品安全问题，而是假冒伪劣、以次充好、消费欺诈等市场秩序问题，应将其从食品安全问题中剥离出来，使监管力量更多投入到对健康风险的治理中。徐楠、周维作了深度访谈。

中外对话：与国外相比，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有什么特点？

王国伟：发展现代农业和食品工业，一方面给人们带来福利，另一方面也必然导致食品安全的风险。微生物污染、

农药残留、兽药残留、重金属、天然毒素、有机污染物、人为添加有害物质等问题，在各国都有较高的发生频率。美国每年 1/6 人口罹患食源性疾病，其中 3000 人因此失去生命。

这些问题在中国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而且我们还有自己的特点。比如说中国的食品生产小、散、乱，市场秩序不完善，社会诚信机制不健全，虽然搞了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配套的规则意识不健全，这使得生产经营者质量安全意识薄弱，人为故意制售有害食品的问题较多。

但是，我要着重强调的是，国人对食品安全的认识还很不够，甚至可以说“避重就轻”，对假食品安全问题议论纷纷，而对真正的食品安全问题知之甚少。“染色馒头”之类的假冒伪劣问题，欺骗了消

费者，但没有健康危害，而且随着治理和市场秩序的完善，总是一种阶段性的存在。但食品工业伴生的食品污染问题，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假食品安全问题”引发的社会情绪，使监管部门疲于应付，制约了技术力量的建设，甚至影响了某些制度的科学性。这是需要全社会深入思考的问题。监管部门应负重致远，有更大的责任担当，埋头苦干、真正强化食品安全风险防控措施。

中国食品产业小、散、乱，是“成长中的烦恼”，但另一方面，西方食品工业高度垄断，也带来了监管无力、存在系统性风险的隐患，这两种形式各自都存在一定的问

题。在规划食品产业发展中，应考虑多元化和规模化的平衡点。至于谁的监管程度好，哪里

中外对话：您怎样概括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基本现状？

王国伟：中国食品安全工作面临四个“不一致”：

第一，问题多发，与人民群众对保障食品安全的要求不一致。

第二，食品安全的监管力量和监管需要不一致。监管体制机制需要改善，特别是监管硬件非常薄弱。中国监管人员一共 10.6 万，而合法企业就有 1000 万户，这还不包括小商小贩和 2.8 亿农户。中国的监管工作必须要借鉴国际规律，从产品抽检、事后查处这种外部监管，转变为以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为依据，以

风险监测、评估预警和执法检验互为支撑，生产过程监管和产品监管相结合的综合监管，要走科学化和专业化的监管道路。食品安全监管是一个专业性、技术性的工作。而我们现在这方面的力量非常薄弱。

第三，公众对食品安全问题的认识和它的现状之间的不一致。其实我们的食品安全问题没有严重到什么都不敢吃的那种程度。我们还没有爆发过去年德国、今年美国那么大范围的食源性疾病。媒体揭露了许多食品安全问题，但也有相当部分被证实是子虚乌有。我们欢迎媒体加强舆论监督，但是还要更加准确、

“60 年安定的生活，似乎让我们淡忘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是怎么度过的，战乱、动荡、政权更迭不会让我们有闲情逸致谈论食品安全之类的生活质量问题。”

客观，说句开玩笑的话，恐慌情绪对人的健康危害甚至要比一种有害食品还要大。

第四，关于食品安全的舆论环境和维护社会和谐的要求不一致。食品安全风险不论多大，它就是一个具体的专业问题，是监管机制顺不顺、技术力量强不强的问题。而现在有一个不好的倾向，把它作为社会问题来谈论。60 年安定的生活，似乎让我们淡忘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是怎么度过的，战乱、动荡、政权更迭不会让我们有闲情逸致谈论食品安全之类的生活质量问题。围绕食品安全，所有一切讨论的根本立足点应该是推动建设性地解决问题。中国的和谐稳定是人民之福。

中外对话：造成“不一致”的关键性原因是什么？

王国伟：第一，发展阶段的原因，刚才提到的产业素质、诚信环境、市场规则等。当然我们的监管效能本质上也是针对这个原因。刚刚解决温饱问题，中国的食品安全监管起步晚，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第二，对食品安全问题，大家觉得很突然。其实很多问题以前也存在，比如糖精，零食中的色素等等，以前人们没有去关注它，现在社会一下子集中关注，给人们强烈的心理冲击。

第三，解决温饱问题之后，人们对健康和生活质量更重视了，都开始寻求健康和安全的饮食，人的生命得到了更大的尊重。

第四，媒体报道和舆论倾向的影响。报道受人关注的事，这是媒体的作用。但媒体报道会对公众产生两个舆论传播效果：一个是自动的纵向联想，在每次一个事件发生后，媒体和公众会自动联想起历史上发生过的其他类似事件，并要求当前的事情为历史上的一系列事件买单。另一个是横向联想，任何一个地方发生了什么问题，各地的人们都会有情绪波动，担心自己吃的东西会不会也有问题。

中外对话：中国政府如何看待现在的食品安全问题？食品安全工作是如何确立的？

王国伟：1978 年改革开放，中国用 30 年时间迅速解决了食品供应问题。解决温饱以后，食品安全问题却呈现出来，在 2008 年三鹿奶粉事件之后引起社会空前关注，成为热点、难点问题。对此，政府也有一个认识深化的过程。

1993 年中国推行的《食品卫生法》，主要从卫生角度着手，包括政府在内的社会各方面，对食品安全的认识还不够深入，法律法规所关注的问题和现在有本质的区别。2008 年三鹿奶粉事件是食



某食品加工车间 图片：zsnews.cn

品安全问题爆发的标志，2009 年《食品安全法》的出台是政府工作力度加大的标志。从那时开始，中国政府开始进入全面加强食品安全管理的阶段。

中外对话：“多龙治水”、多头管理的格局，一直是困扰中国综合管理的现实因素，并且具有较强的惯性。就食品安全问题来说，中国的哪些机制或工作体系需要改进？

王国伟：目前政府加强食品安全工作主要有几个方面：

一是，在原先保障供应的目标下，建立的这套管理体系要改变。以前是农

业部门管农产品生产，质检总局管食品企业，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管饭店餐饮，工商总局管市场销售，这种分段式的管理是要改进的。它造成食品监管上的摩擦成本，无法从根本上形成全程监管的格局。所以现在成立了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把几个管理部门统筹起来，出现问题一起处理，综合协调。当然这是不是彻底，是不是还要进一步整合监管资源，理论界在探讨，有关部门也在研究，体制机制的改革需要先有共识、并积极稳妥的推进。

二是加强监管。从 2009 年《食品安全法》建立，确立了风险监测、评估预

警制度，到 2010 年食品安全标准评审委员会成立，到 2011 年成立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我们食品安全的专业监管、技术监管的工作才刚刚起步。

比如对一块巧克力，我们需要预先制定一些成分的标准，根据指标进行执法检查。如果超过这个标准，我们就认为它是不安全的。但即便企业完全依照工艺流程生产，也不可能保证完全的达标，因为总会有一些意外的污染。因此需要给问题食品留有一个允许存在的量，超过这个量我们就要处罚它。这需要制定科学的标准。

但对于有些意想不到的物质还是无法检验出来，食品安全监管无法穷尽所有的不良物质。政府每年公布一个黑名单，叫做“易添加的食品有害物质黑名单”。根据物质品种判定哪些物质加入食品会对企业造成利润，然后制定检验方法，市场研发监测仪器，政府采购，形成新的执法手段。这些东西进入执法标准，才能变成监管效力。

执法检查是对企业处罚的依据。2011 年政府成立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则是在执法体系之外的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体系。它在全国布设了很多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点，现在每年获得 40 万个监测数据。它跟其他检测有所不同，没有指标限制，它的仪器非常灵敏，随机抽样，与医疗结构联系，不作为执法依据。它是用于总结

分析的。但是目前风险监测还非常薄弱，将来则是发展的大势所趋。

另外，要建立一系列的制度体系。我们现在对食品 28 大类全部建立了准入制度。对食品及食品添加剂新品种、新原料的安全性建立评估制度。任何食品出厂，都需要进行正规检验。此外，国家监督抽查制度，密度和频次在逐年加大。一系列制度保障了我们从正规渠道买到的食品是安全的。但只能保障在国家控制指标下是安全的，是相对的安全。

中外对话：对于中国的应对食品安全工作，是否有可供预期的时间表？

王国伟：国务院刚刚发了文件，是关于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争取用三年左右的时间，解决食品安全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用五年时间建立一个科学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成立监管队伍。但要真正实现食品安全问题的根本好转，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而且，有必要确立这样的科学认识：食品安全没有零风险。🌀

徐楠 中外对话北京办公室副总编辑

周维 中外对话北京办公室编辑

有机认证拯救食品安全？

● 文 / 周维

编者按：在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的今天，中国有机认证是否还保持着创立伊始的初衷？它是否能够缓解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周维采访了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亚洲代表，环境保护部有机食品发展中心顾问周泽江。

中外对话：中国的有机食品认证，您认为在管理方面做得怎样？

周泽江：从行业本身来看，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但我认为，中国有机食品大多数都是好的。如果以 100 分满分，60 分及格来评判的话，中国有机认证大多数应该在 70 分以上，有一些做得相当好，完全可以达到国际水平，当然不排除也有一些做得不好，不及格的，甚至做假的。

国家认证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台新规新标以后，现在实行的是“一品一码”的管理，要求有机食品上市包装必须贴 17 位可追溯码，追溯信息规定得很全面，包括规格、产地、生产者、认证者。只要消费者有心，当场就可以验证。如果是未经认证的产品，一验便知。标志是根据认证的产量来核发的，商家想搭车多卖，也不行。



某超市的有机食品专区 图片：三联生活周刊

客观地说，这种力度的追溯管理，在全世界有机认证中，也是独一无二的。

中外对话：几年前，曾有一些市面上的有机食品被爆出是普通农产品，我们该如何评估今天有机认证的可靠程度？

周泽江：刚才说到的国家认监委关于有机认证的管理办法，其实就是被逼

出来的，原来有点太乱，这也属于一种矫枉过正。新办法出来以后，明显的好处是市场上没有假货了。

当然不能说，整个认证体系从此就完全没有任何诚信问题了。还是有难解决的问题。认证业务本身跟认证机构的效益是挂钩的，认证质量也存在一个审核问题。除此之外，被认证的企业有可能作假——认证检查的时候一套，不检查的时候是另一

套。所以，消费者在市场上买到的有机产品，可以确保是经过认证的，但并不表

示百分百严格符合有机标准，这就要看认证和监管的水平了。

现在认证人员到了被认证单位，拿一点礼品是普遍被接受的、认为没什么瑕疵，尤其是生产单位的产品，但是额外拿钱毫无疑问是违背原则的。但我们不能说拿钱的行为在现实中不存在。至于程度，有机认证行业的平均诚信程度跟其他认证是大体一致的，不会高出太多，因为存在于同一个社会大环境之下。如果有些行业腐败、监督腐败不解决的话，依靠再多的认证机构也是没有用的。

有机是个良心事业，一味靠严管不是办法，需要消费者、社会各方面共同监督。

中外对话：中国有机食品认证工作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周泽江：中国 1989 年开始引入“有机”这个概念，1990 年就已经有国外的认证公司开始在中国做认证了。1994 年中国成立了第一个本国的认证机构，1995 年第一次开始认证有机食品，1999 年第二个认证机构成立。此后有机认证在中国发展，到了 2004 年达到高潮，全

国最多时候有 30 多个认证机构，认证面积最高时达到 330 万公顷。后来又逐渐调整，到现在有 23 家认证机

构，面积保持在 200 万公顷左右。

1990 年到 1998 年，中国有机食品认证几乎全部是为出口认证服务的。1999 年以后，才在国内市场发展起来，现在国内有机食品的销售额早已经远远超过了出口额。

中外对话：中国有机食品认证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什么变化？您怎么看待这样的变化？

周泽江：有机食品认证开始是由环保部门发起建立的，由当时的国家环保总局管理，2003 年转交给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国家认监委”）。

在经历 2003 年到 2004 年的大发展

之后，2005 年，《有机产品国家标准》发布实施，国家开始对有机认证进行整顿，认证企业和面积减了下来。

有机认证开始建立时的出发点并不是食品安全，而是为了发展生态农业，保护生态环境。后来食品安全问题显现之后，“有机”的概念被拉到了食品安全的路上，几乎变成了雪中送炭的应对方案，有机农业变成了食品安全的重头，我认为这是不对的。

事实证明，过于强调有机认证在食品安全中的作用，反倒会误导消费者，起到不好的影响，也会使有机认证走向非正常发展，甚至会引诱不法商人造假。

中外对话：您认为国家在对有机认证管理方面，存在什么问题？

周泽江：实际上，有机食品在中国市场上所占的比例远远低于 1%。相对于其他食品，它吸引了过多的监管力量。

有机食品不允许使用任何农药化肥，这在监管要求上是最高的，但由于有具体的指标可以参考，反而比对其他安全食品容易监管，而且消费者对价格明显高于其他安全食品的有机食品的关注度也更高，因此有机食品实际上成了监管的重点。国家认监委花了很大的功夫进行有机认证的监管，我们现在实施的有机认证产品追溯系统已经是全世界最先进的。

什么东西好监管，就去多监管，这

在食品监管上是不太成比例的。真正的“有机”主要得靠企业自己的努力，靠市场去推动，政府既不应该脱离实际地一味激励其发展，也不宜长期依靠矫枉过正的措施来控制其发展。

在对有机食品、绿色食品、无公害农产品认真监管的同时，国家的监管力度应该更多放在常规食品上，所有的食品都应该是安全的，这是根本。有机食品、绿色食品和无公害农产品应该是在食品总体安全的基础上的一种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

中外对话：对有机食品和认证体系，在您看来最理想的状态是什么？

周泽江：要想做好有机食品，政府需要多种措施、多种方式的工作，对监管、实施和从事行业生产的人都要管理。此外，还应该推广有机知识，让消费者一起参与到有机产业的发展和监管中来。

除了认证之外，我比较推崇建立在民间的诚信体系。在有责任感的消费者和诚实的生产者之间建立互相信任的生产和消费关系，鼓励就近生产，就近消费，减少食物里程，保护生态环境，节约资源。如果各地都建立起这样的模式，就可以在全国形成相当规模的食物安全生产和消费体系。

周维 中外对话北京办公室编辑

自己动手，创新食品供应链条

文 / 吴晨

编者按：面对当前的食品安全问题，中国的企业在做什么？吴晨分析介绍了企业在产业链中尝试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两个案例。

在当前中国社会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问题之下，各方力量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探寻可能的创新。一些案例可能为我们提供一些启发和借鉴。

偏居一隅的茶场：
如何才能确保“用心”？

在食品加工企业中，99.8%的企业都是中小型食品企业（2010年统计数据），在媒体报道中，他们多半被描绘为随意从农户手中收购原材料，之后在简陋的条件下进行不安全加工。

2008年笔者去云南省普洱市调研茶



茶厂远景。“中国大规模的食品企业只占据0.2%，利润额却占据了22%。对于四万多家中小食品企业而言，你很难用规模指标来断定其管理水平、食品质量就会低于大企业。”图片拍摄：吴晨

叶行业。此前曾经看过几个车房设备一流的规模化茶厂，从食品安全的角度来讲，问题仍在于软件，即生产流程的不规范，管理粗放。在种植环节则依靠周

边农户的供应。

在一位朋友的推荐下，笔者辗转一个多小时，去看山坳里的一间小型茶叶企业。茶厂在一条山间小道的尽头，厂房规模紧促。但令人惊讶的是，一排吊脚楼式的木质建筑，盖着用来遮挡灰尘的透明薄膜，是烘干毛茶的场所。

车间的每一个角落都整洁有序。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工人都有自己的一套小砖房，和家人居住在一起。茶园里有圈养的猪，用于供应一年中工人们肉食。散养的鸡除了下蛋之外，还能够吃掉茶园里的害虫。

这个茶园在昆明茶叶市场的一个不显眼的销售点，出售他们800亩地的全部产出。没有更多的宣传，价格也与普通茶叶持平。

销售对象基本是固定的购买者，一些人慕名而来。

这间茶厂的主人是当地颇有名望的茶叶专家夫妇。老太太已经过世，老爷子也已八十多岁，他们的儿子告诉我，两位老人一辈子都在和茶叶打交道，真正爱茶懂茶，所以想做出中国最好的普洱茶。

食品是一种用心生产的产品，而不是流水线作业。很多企业都将此奉为口头禅，但只有在这间偏居于普洱山区一隅的小茶厂里，笔者才真正感受到这句话在日常生产实践中的体现。

互联网：消费者改变市场？

无论是小型食品企业，还是许多仍在坚持按照自然农法来完成当地特色产品生产的农户、农业合作社，由于多数地处偏远，也因此能够获得远离现代工业污染和流水线作业的机会，但对于这些生产者而言，最难解决的问题便是铺设销路所需要耗费的成本。



某茶叶集团的茶叶生产车间



文中所述小规模茶厂的烘干房

目前中国超过 95% 的乡村已经被不同的网络运营商覆盖，商业物流公司已经能够抵达三线城市的乡镇。这给小型食品生产者创造了入驻电子商务网站的条件，通过在线销售和物流来链接终端的消费者。

据统计，目前淘宝网商家销售的自制食品达 2500 种，进入淘宝天猫商城的食品商家有 3800 家。

对于网络商家而言，获取消费者的信任的主要手段在于“信息透明”和“交互式”，即整个生产过程毫无保留地呈现给消费者，提供及时地信息反馈，以回答消费者的疑问。此后，网络商家还需要通过营造“熟人社区”来保证信任感的可持续，以取代工业生产中的各种质量认证。

对于消费者而言，要从各种电子商务平台的竞价排名中寻找真正值得托付的食品商家，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但是，这个主要以年轻女性白领和为宝宝寻找安全食品的年轻妈妈们组成的消费群体，一旦通过多次试错或者口耳相传锁定了某网络商家，其特有的“组织化传播方式”，便能够使得商家的固定客户呈现几何级数的增长。

所以，那些愿意做出改变的企业和农户，以及那些愿意托付信任，用行动来追求安全食品的消费者，值得尊重。这样的人散布在中国的城市和乡村之中，

是重建信任社会的肇始力量。也惟有在信任社会中，我们才能获得安全的食品。

作为一名 80 后的网络消费爱好者，我相信互联网在瓦解了人们对权力的盲目迷信之外，也将一片废墟之上重建信任社会。食品安全问题将是一个起点，消费者通过网络建立起基础的权益意识，创造团结起来的机会，那么消费者将不仅为自己、为后代争取到安全的食品，也将获得在中国重建信任社会的机会。☺

吴晨 社会资源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欧盟－中国公民社会对话项目
EU-CHINA CIVIL SOCIETY DIALOGUE

项目支持



British Embassy
Beijing

合作指导



German Asia Foundation



中山大学·中国社研中心
Institute For Civil Society · Sun Yat-Sen University

责任编辑：周维

美术设计：李海宾



“中外对话”是世界上第一个中英双语的环境报道和分析网站，围绕中国环境、能源、应对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议题，自 2006 年创办以来，已经成为英文世界获取中国相关信息的重要直接来源之一。根据浏览访问信息的统计，其读者遍及世界 190 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在伦敦、北京、印度德里设有办公室，刊载高质量的独家报道与分析。

主页：www.chinadialogue.net

新浪、腾讯微博：@ 中外对话